

#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普考通

## SOCIOLOGY OF ETHNICITY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第 199 期

2015 年 1 月 15 日

\*\*\*\*\*

### 目 录

#### 【论 文】

论族际个体矛盾的“去民族化”

郝亚明 赵志远

东南亚华裔青年眼中的中国形象

——基于两广地区东南亚留学生的问卷调查分析

梁茂春 陈文

藏族大学生就业意向问卷调查报告

《雪子》杂志社

传统文化承载者的世纪变迁——李健《西藏的唐卡艺人》书序

马戎

☆☆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 【论 文】

# 论族际个体矛盾的“去民族化”<sup>1</sup>

郝亚明 赵志远<sup>2</sup>

**摘要：**族际个体矛盾与民族矛盾两者存在一定关联，但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社会现象。族际间个体矛盾的发生兼具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在现实生活中极易被有意无意地导向民族矛盾，这种“民族化”的倾向对于多民族国家建设极其有害。要针对族际个体矛盾“去民族化”，需要从“去政治化”、“去敏感化”、“法制化”以及“领域分立”等多种途径探究其解决方法，这对我国和谐民族关系的发展和依法治国的推进都有着理论和现实的意义。

**关键词：**族际个体矛盾；民族矛盾；民族关系；“去民族化”

我国的民族关系长期保持着稳定、平等、团结、和谐的总体局面，而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对此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在大规模人口流动的背景下，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方面具有差异性的不同民族在相互接触相互适应的过程中难免发生个体间的冲突。而对于民族身份的过度强调，往往导致族际个体矛盾十分敏感，原本属于人际关系层面的族际个体矛盾被“民族化”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不能把涉及少数民族群众的民事和刑事问题归结为民族问题，不能把发生在民族地区的一般矛盾纠纷简单归结为民族问题”<sup>[1]</sup>。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将族际个体矛盾与民族矛盾区分开来，以“去民族化”的方式处理相关问题，对我国依法治国的推进、民族关系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 一、族际个体矛盾与民族矛盾的概念辨析

族际个体矛盾强调具有不同民族身份的个体成员之间发生的矛盾事件，“广义上讲属于人际关系层面的矛盾。”<sup>[2]</sup>而“民族矛盾是民族间的利害冲突”，<sup>[3]</sup>是不同民族间的矛盾。

族际个体矛盾与民族矛盾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但在本质上又是完全不同的社会现象。一方面，族际个体矛盾强调矛盾双方在民族身份上的差异，因而有别于一般性的个体矛盾，容易被扣上“民族矛盾”的帽子。根据我国现阶段的情况来看，矛盾双方多涉及少数民族个体成员与汉族个体成员，民族身份的差异性使得族际个体矛盾相对一般性的个体矛盾更为敏感。另一方面，它也强调矛盾的性质在广义上属于人际关系层面的矛盾，应当与民族矛盾区分开来，对族际个体矛盾的处理应限制在法律框架内，依法依程序对其进行相应的处理。然而由于“民族身份”的介入，有可能对族际个体矛盾处理中法律的程序性和公正性造成影响。

族际个体矛盾的特殊性还体现为它与民族矛盾的区别和联系。族际个体矛盾不同于民族矛盾。“民族矛盾反映的是单位族际之间的矛盾，而族际个体矛盾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成员个体之间的矛盾关系，二者不能混淆。不能笼统地把族际个体矛盾归属于民族矛盾的范畴”。<sup>[4]</sup>过分强调民族身份，使个体矛盾“民族化”，就会使法律失效。族际个体矛盾与民族矛盾之间又存在着联系。首先，在一定的条件下，族际个体矛盾可能会向民族矛盾的方向转化。例如，对族际个体矛盾处理方式的不当，由民族个体成员引发的人际关系矛盾就有可能转化为大规模的民族成员冲突事件，进而演化为民族间的冲突，从而破坏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影响民族团结大局。又如，民

<sup>1</sup> 本文刊载于《广西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第14-20页。

<sup>2</sup> 郝亚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赵志远，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学生。

族个体成员之间的矛盾可能会被分裂势力利用，使其扩大化为民族矛盾。我国的民族复杂多样，民族关系一旦处理不当，就容易给民族分裂势力和境外的反华势力以可乘之机，从而达到破坏我国统一安定的目的。其次，民族矛盾对族际个体矛盾有反向的影响作用。由于经济文化、传统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不同民族之间关系紧张可能会影响族际个体成员之间的关系，从而引发族际个体成员之间的矛盾。

族际个体矛盾与民族矛盾的特殊关系，给族际个体矛盾的处理带来了更多的阻碍。为避免由族际个体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并进而演化为民族矛盾，很多执法者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的处理办法。这种处理方法不仅不利于我国的法制建设，破坏了执法过程的规范性和程序性，使得法律有失公平性和公正性，同时还客观强化了不同族际间的差别，增强了不同族际间的排斥力，不利于民族团结。对少数民族成员区别对待的做法违背了法律程序的处理方式，表面上暂时缓解了族际个体成员之间的矛盾，却为更多此类现象的产生埋下了隐患。

## 二、族际个体矛盾多发的原因及危害

族际个体矛盾是破坏社会秩序、引发社会不安定的因素，族际个体矛盾多发，其累计效应就会影响到民族关系的健康发展，其危害不可小觑。族际个体矛盾多发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加以分析。

族际交往的增多是导致族际个体矛盾多发的重要条件。人口流动的限制逐渐减少，各民族交往与融合的趋势增强，交流方式从过去少数民族实行小聚居、彼此交流较少的“背对背”变为了各少数民族走出聚居区、直接交流频繁的“面对面”。不同民族成员之间接触领域范围的扩大和接触频率的增加，使得正面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增多，冲突发生时双方又往往忽视合法的途径维护自身权利，导致族际个体间的矛盾常常以暴力的、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

文化的差异性客观条件是客观条件。不同民族在语言、文字、饮食、宗教信仰以及生活习惯上都有或多或少的差异，想要消除这种历史性的差异是不现实也是不可取的。对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宣传的不到位，这种差异就会不断以矛盾冲突的形式体现出来。语言导致的交流障碍往往会导致不必要的矛盾，饮食方面，尤其与宗教信仰联系起来，对少数民族文化的陌生就会导致严重的冲突。汉族文化作为主流文化存在的历史性，还往往容易在城市汉族居民中产生“大汉族主义”的倾向，处在主流文化边缘的少数民族容易在生活上和心理上被边缘化，使得族际个体关系更加脆弱。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与竞争的因素增多也是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的状态，经济的单项突进拉大了物质与精神文明发展的差距，法律意识的欠缺是暴力冲突事件发生的催化剂。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使得民族地区差异逐渐凸显，不同民族在经济上的分层也越来越明显。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下，个体间的利益矛盾，尤其是从事服务行业的个体间的竞争带来的摩擦、冲突频频发生，这种情况发生在族际个体之间就更容易演变为群体性事件，形成破坏社会安定的因素。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是族际个体矛盾高发的人群，这是由其自身的一些特点决定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结构中的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空间孤岛化”和社会生活的“内卷化”，与城市居民之间形成了“二元社区”的结构。少数民族在城市社会地域分布上的“聚居”，是分布空间上“孤岛化”的表现。很多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生活以及交流的范围被限制在本民族的圈子中，尤其是基本专业技术的缺乏导致其在就业方面限制较大，主要从事的带有浓厚的少数民族特色的餐饮业和服务行业，容易形成少数民族在职业地域分布上的“聚居”。“二元社区”的形成，导致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缺乏。少数民族人口流动过程中族群社会网络的带入容易使得族际个体间的矛盾演化为群体性事件。戈登在其“二维度模型”中指出，社会融入包含结构性与文化性两个维度，结构性的社会融入是指移民在流入地的生活中行为适应度的增加，而文化性的融入是指移民在价值观念和身份认同上的转化<sup>[5]</sup>，恩泽格尔在其“四维度

模型”中又加入了经济收入、职业状况、社会保障<sup>[6]</sup>等更加细化的标准，可见“二元化”结构在心理认同和地域分布上产生的隔离效应，都对族际个体矛盾的多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族际个体矛盾的多发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与我国民族关系的处理方面都有着极大的危害。首先，族际个体矛盾多发扰乱了我国的社会发展秩序，带来了诸多不安定因素，在当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容易被敌对势力利用，威胁我国的统一安定。其次，族际个体矛盾的多发也不利于我国少数民族成员的社会融入，容易形成不同民族间的偏见与排斥，危害民族关系和谐，不利于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再次，族际个体矛盾的多发成为我国法制建设道路上极大的阻碍。减少族际个体矛盾的发生能够为我国的法制建设营造良好的环境，从而进一步将矛盾的处理纳入到法制的轨道上，形成良性的循环。最后，族际个体矛盾的多发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族际个体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是与我国和谐社会的建立背道而驰的，极大的破坏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成为我国发展道路上的阻碍。同时族际个体矛盾的多发与族际个体矛盾的“民族化”之间也有着紧密的联系，族际个体矛盾的“民族化”现象正是基于族际矛盾的多发且难以解决的事实才得以产生的。

### 三、族际个体矛盾“民族化”的趋向分析

族际个体矛盾自身的特殊性及其与群体性事件和民族矛盾之间特殊的关系，使得执法者容易在处理族际个体矛盾时陷入困境。族际个体矛盾的“民族化”趋向由多种原因造成。

首先，文化差异角度上民族身份的工具化是导致族际个体矛盾“民族化”的重要因素。工具论从社会行动的角度指出族群被视为一种社会工具，从而服务于社会竞争<sup>[7]</sup>。表面上多发于文化习俗领域的矛盾冲突，很大程度上是资源竞争的一种体现，因而很容易被扣上了“民族身份”的帽子。对少数民族文化宣传教育工作的不到位，使得民族身份的工具性作用愈显突出。很多执法者对涉及民族因素的问题过于敏感，其态度往往是迁就或避而不谈。文化差异可能导致分歧的产生，但当族际个体矛盾成为民事、刑事案件时，其处理过程就应当在合理合法的程序下进行，不应让“民族身份”的因素持续影响矛盾的解决，一旦这种合理存在的差异被滥用了，相关的族际个体矛盾没能依据法律和法律程序处理，就会造成权利不平等的现象，促使族际个体矛盾向“民族化”的方向发展，甚至在文化、宗教信仰等差异的渲染下上升为民族文化之间的对立。

其次，对“民族身份”与“公民身份”的认识不够清晰也是族际个体矛盾“民族化”的重要原因。“民族身份”在某些领域内的确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特殊性，但是“民族身份”的特殊性是建立在“公民身份”基础之上的，“民族身份”的特殊性要以政治一体化作为基本前提。法律意识和公民意识的欠缺，使得族际个体矛盾发生时，少数民族成员更容易倾向于“民族身份”而非“公民身份”，从而导致“民族身份”的滥用，甚至激发少数民族群体内部的“凝聚力”，进而引发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促使个体矛盾向民族矛盾转化。

再次，少数民族人口中“非正式组织”的存在使得个体间的矛盾更容易转化为群体性事件，使族际个体矛盾被“民族化”。大规模人口流动的过程中，移入地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更加容易通过族群身份建立非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自身以情感、喜好等情绪方面的纽带连接，本身是非常松散的，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属于时间、地域、文化的三维空间移民”<sup>[8]</sup>，这使得由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构成的非正式组织具有整体性、排外性和强向心力的特点，加上社会的排斥，这种向心力与排外性就表现得更为强烈，因而它的作用也就体现得更为明显。不同民族个体成员之间的矛盾往往容易激发起这种特殊非正式组织的“民族意识”，导致个体间的矛盾转化为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进而上升为民族矛盾或是被利用来破坏我国社会的安定以及国家领土与主权的完整性。

最后，从民族政策的导向来看，一些偏向给予优惠的政策在缩小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性的同时还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民族优惠政策依法赋予少数民族群体及其地区在政治、经济、文

化、教育、社会和公共卫生诸方面享有高于一般行政地方的优惠”<sup>[9]</sup>。过于注重“给予”而非增强自我发展“造血”能力的民族优惠政策会带来负面影响。一是潜在地使不同民族之间的边界“清晰化”和“制度化”了，在与汉族人口杂居的地区，优惠政策可能使少数民族成员在理念上将“我是少数民族”的想法清晰化，“民族身份”的强化为个体矛盾“民族化”带来了“合理性”。二是容易给少数民族成员一种理应被优待的心理感受，甚至发展成为一种畸形的“特权”思想，由于法律意识上的欠缺，加上一些相关案件的处理不当，更是加重了这种心理，为“公民身份”的认知带来了更大的困难。这些“给予”性的优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为依法治国所提出的“实现国家治理活动的规范化、程序化、法制化”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民族身份的工具化、“公民身份”认知的欠缺、“非正式组织”以及“给予”性优惠政策的弊病促使族际个体矛盾的“民族化”趋向更加明显，使得对涉及民族因素问题的处理更加棘手。要将族际个体矛盾置于法律和社会制度的框架下来解决，就需要针对以上问题来探究其应对方法。

#### 四、族际个体矛盾的“去民族化”

族际个体矛盾的“民族化”兼具长期性与复杂性的特点，针对族际个体矛盾的“去民族化”，可以从“去政治化”，“去敏感化”、“法制化”和“分立领域”等多个视角来探讨其应对方法。

##### （一）族际个体矛盾的“去政治化”

尽管对于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存在争议，但它为我们处理族际个体间的矛盾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去政治化”侧重从“公民”、“个体”的角度来处理民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将族际个体矛盾以个体成员和个案的形式表现出来，将其限制在社会关系的范畴之内，以“公民身份”来取代少数民族成员的“民族身份”，在文化、宗教、习俗等方面保护其独特性的同时，在政治层面更加强调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族群<sup>[10]</sup>问题上的‘政治化’趋势改变为‘文化化’的新方向，培养和强化‘民族-国民’意识，逐步淡化族群意识。”<sup>[11]</sup>

“从中国的传统来看，中国自古就是用文化来区分不同的族群的，文化也是处理族群关系最主要的因素。”<sup>[12]</sup>在国际上，欧洲委员会用于指“少数民族”的概念，首先强调“少数民族”身份的国民性，强调少数民族成员最重要的属性是该国的公民。其次强调“少数民族”自身在文化、语言、宗教上的综合性。再次，强调“少数民族”在人数上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弱势性和从属性。最后强调少数民族在意识上的自我认知性。关于少数民族成员的政治属性问题，有学者做出界定，“第一，作为民族，‘少数民族’也是其所在国的国民一员，应尽作为国民的义务，即遵守国家的法律，捍卫国家的统一和完整，维护国家的尊严和利益；第二，作为‘少数’的地位和身份不应成为影响其拥有和享受平等权利的理由，他们应有权维护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享有民族平等的权利”<sup>[13]</sup>。它强调“少数民族”的政治属性是基于整个中华民族这个政治实体之下的作为公民的政治属性，基于政治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的理念，逐渐将族际个体矛盾置于文化与制度的框架内，淡化个体冲突中成员的“民族身份”，以平等的政治身份来对看待矛盾双方，进而做到在法律框架内通过合法的渠道来解决民族个体成员之间的矛盾冲突。

##### （二）族际个体矛盾的“去敏感化”

族际个体矛盾之所以“敏感”，一方面由于处理涉及民族因素的问题时，地方政府或相关部门自身过于敏感，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有时甚至以牺牲法律尊严为代价。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排斥、制度不完善等因素导致对“民族身份”的敏感。因而，从“去敏感化”的角度处理族际个体矛盾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培养民汉双语兼通的干部，尤其是民汉杂居的地域，应当对汉族干部进行适当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培训，加强其与当地少数民族成员的沟通交流，避免沟通不畅带来的阻碍，从执法者自身做到“去敏感化”，从而更好地将族际个体矛盾主动纳入法律程序。

第二，降低社会排斥，“推动建立相互嵌入式社会环境和社区结构”<sup>[14]</sup>，从“摘掉标签”到“去除敏感”。不仅要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投入，加强法律教育，降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违法犯罪和社会治安问题发生率，减少城市居民对少数民族成员的排斥，促进少数民族成员对其自身的身份认知主动从“民族身份”向“公民身份”转化，主观上降低“敏感性”，同时还要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文化水平与职业技能，促进少数民族成员从事的行业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从而增强少数民族成员的自我认同感，打破空间分布上的“二元化”结构。推动相互嵌入式社会环境和社区结构的建立，要做到消除社会结构上的碎片化、平等分享社会资源以及构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社会认同，从而促进少数民族在社会结构、社会资源和社会心理上全方位的社会融入。<sup>[15]</sup>

第三，从“民族身份”到“公民身份”的“去敏感化”。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加强城乡协同发展，注重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进基础设施的建设，避免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产生过大的差距，从民族政策的导向上，减少“给予性”的民族优惠政策，鼓励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自我发展，通过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色优势产业等方式，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造血”能力，从而达到从消除地区间的不平等到消除心理上的不平等，淡化“民族身份”带来的敏感性。

### （三）“法制化”视角下的族际个体矛盾

将族际个体矛盾置于法律的框架内，以法律体系为载体，在正规的法律程序下依法对其进行裁断，是族际个体矛盾“去民族化”的保障。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其中提到“依法治国的要义是实现国家治理活动的规范化、程序化、法制化，也就是实体和程序的全面制度化，要达到让法律和制度成为社会治理的基本途径。”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期也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中强调区分涉及少数民族成员的民事刑事案件与民族问题，将对族际个体成员间矛盾的解决纳入法律的轨道。对族际个体矛盾的不当处理，会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爆发，而执法者非程序化与非合法化的行为，表面上缓解了矛盾，实际上却埋下了更大的隐患，不仅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也成为了我国推行依法治国道路上的阻碍。“法制化”视角主要从科学立法、执法有据、培养公民法律意识和法制化管理来实现族际个体矛盾的“去民族化”。

首先，科学立法，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避免地方政府在处理族际个体矛盾时为了保“安稳”而牺牲法律的规范性与严肃性，防止矛盾双方中任何一方的合法利益受到损害，避免为以后类似事件的发生埋下更大的隐患。

其次，执法有据，一是强调在法律体系的范畴内对族际个体矛盾依法进行裁判，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法定的程序处理民族个体之间的矛盾，公平公正地对待矛盾关系中的每一位当事人。二是强调执法的程序性，实现程序的制度化，去除“民族身份”的影响，保障矛盾双方的合法权益，将依法治国落到实处。

最后，通过培养公民意识与法律意识，加强法制化管理来实现族际个体矛盾的“去民族化”。公民意识与法律意识的培养不仅针对少数民族成员，应当落实到全体公民。普及法律知识，加强法律学习，达到公民知法、懂法、守法，这是推进依法治国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同时，政府要加强法制化管理，正视民族个体间的矛盾，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平等看待矛盾双方，端正心态，以处理矛盾、解决问题为目的，依法依程序，从执法者的角度杜绝“民族身份”对裁断公平、公正性的干扰。

### （四）“领域分立”视角下的族际个体矛盾

“现实的社会生活既有关涉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利益的一面，又有各种不同的社会分立的群体分立的利益存在。……所有多数人和少数人群体的成员在平等的基础上依存共同的规则进行互动的领域称之为社会上的共同领域。……分立领域是在社会中那些属于民族，宗教或语言上的少数人群体成员维护其群体特性和认同的领域”。<sup>[16]</sup>所谓“领域分立”的视角，就是要根据问题发生

的领域将族际个体矛盾区分成共同领域内的矛盾和分立领域内的矛盾，不同领域中的族际个体矛盾在处理原则上可酌情存在差异。

在分立领域内，针对少数民族文化、宗教等利益相关的族际个体矛盾，要在依法治理的前提下，充分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充分尊重少数民族个体成员在相关分立领域内的权益。一方面，要通过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宣传教育，促进各民族的相互了解、相互学习和相互包容，减少以文化差异为诱因的族际个体矛盾的发生。另一方面，要注重保护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族际个体矛盾发生时要充分考虑到少数民族成员在信仰、文化等方面的特殊性，给予充分的尊重和适当的照顾。在共同领域内，对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的处理要坚持在法律范围内和法律轨道上进行处理，要依照法律程序，剥离“民族身份”的影响，维护矛盾双方的合法利益，不能将共同领域内的族际个体矛盾当成民族矛盾来处理。

#### 四、结语

族际个体矛盾的应对与处理与我国民族关系发展、健康社会秩序的建立以及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都有着紧密的联系，也是我国在未来的发展中维持国家稳定有序所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我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处理民族关系始终是发展道路上的重中之重，在不断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国务院也提出了将族际个体矛盾与民族矛盾区分开来，从而加强我国的法制建设，推进我国的现代化进程，维护我国统一稳定，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建立。从对族际个体矛盾“去民族化”的角度提出的“去政治化”、“去敏感化”、“法制化”以及“分立领域”等解决途径都为族际个体矛盾的应对提供了新的思路，对我国未来更好地处理民族关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正确认识族际个体成员之间的摩擦，把握好处理族际个体矛盾的“度”，有利于我国今后民族关系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4-12-23（01）
- [2] 姜明，侯丽清.论民族交往中的个体矛盾[J].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1997，4（4）:35-39
- [3] 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4776
- [4] 唐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矛盾研究[C]//谢立中.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7
- [5] Milton M Gordon.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J].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68
- [6] 梁波，王海英.国外移民社会融入研究综述[J].甘肃：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0，2（2）：23-25
- [7] 关凯.社会竞争与族群构建：反思西方资源竞争理论[R].民族研究，2012，9（9）：8
- [8] 王平.关于城市少数民族人口流动若干特点论析——以甘肃省兰州市为例[J].民族教育研究，2008，2（2）
- [9] 陈建樾.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民族问题的解决——评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与“文化化”[J].世界民族，2005,5（5）：6-7
- [10] 北京大学马戎教授首先提出了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观点.马戎教授首先对“民族”和“族群”概念做了详细的区分，认为在我国，应该以偏重于强调文化性的“族群”概念替代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概念，突出不同“族群”在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差异，淡化“民族身份”意识.
- [11] 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6）
- [12]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1989，4（4）
- [13] 李红杰.论民族概念的政治属性——从欧洲委员会的相关文件看“民族”与“族群”[J].民族研究，2002，4，（4）
- [14]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4-12-23（1）
- [15] 郝亚明.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型社会结构[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7（619）
- [16] 周勇.少数人权利的法理[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19-20

**【编者按】**中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并把重点发展经济以来，中国的经济确实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国民的理想追求和道德水准出现严重滑坡。我在 20 年前曾提出应“重建中国的社会主体文化”，这一历史任务并未有实质性的推进，以至于连“诚信”、“友善”这样的基础性道德底线都需要被提到“核心价值”的高度。

在亚洲邻国乃至世界各国民众的眼里，中国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其他国家的民众和青年在各方面是如何评价今天的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我们身处在这个社会之中，很可能对许多现象已经熟视无睹甚至变得麻木，但是在外人眼里，他们自会把中国与本国以及他们接触到的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在对比之中把各国社会之间的差别看得十分清晰，正所谓“旁观者清”。

下面的这篇调查报告向读者展示了在广东、广西两地来自东南亚留学生眼里的“中国形象”，而且把华裔学生与非华裔学生进行了对比。调查的有效问卷近 1200 份，人们也许从样本规模和抽样方法的角度来质疑这一调查的代表性，但是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方法论问题，但是这一报告所揭示的调查结果仍然是非常值得国人深思的。我们比原来富裕了，但是我们的精神生活比原来更加丰富与充实了吗？我们得到了邻居们更多的尊重吗？假如不是如此，那么问题出在哪里？现在大家都在谈论“一带一路”，可是沿线这些国家的民众和青年们是怎么看待中国？怎么看待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与合作设想？这些留学生都在中国学习多年，其中一些还得到中国政府奖学金的资助，为什么他们在中国生活几年后，对中国一些方面的印象反而愈加负面？难道我们不应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吗？

（马戎）

## 【论 文】

# 东南亚华裔青年眼中的中国形象<sup>1</sup>

## ——基于两广地区东南亚留学生的问卷调查分析

梁茂春 陈文<sup>2</sup>

**摘要：**世界各地的华人在中国国家形象的宣传与构建过程中究竟能发挥何种作用？通过对两广地区 15 所院校东南亚留学生的调查，结果发现：东南亚华裔留学生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评分，无论是来华前还是来华后均低于非华裔留学生的评分，低于他们对各自国家的评分，更远低于其对美国、日本的评分，而且来华后对中国“软实力”方面的评分反而有所降低。这些结果表明，东南亚华裔留学生并不因具有中国血统、保持较多中国传统文化而非华裔群体对中国有更积极的评价，其中原因值得我们深思。在构建良好中国国家形象方面，如何促使华裔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这一问题值得研究。

**关键词：**东南亚华裔 留学生 中国国家形象

### 一、问题的提出

海外华人<sup>3</sup>在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过程中究竟能发挥何种作用？这个问题一直以来存在着争议。

<sup>1</sup> 本文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3 年第 3 期。

<sup>2</sup> 作者为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副教授，国际关系学院研究人员。

<sup>3</sup> 海外华人一般是指拥有中国血统、已经取得所在国国籍的外国公民；华裔则是指在海外出生并已加入当地国籍的华侨华人后裔。为了叙述方便，学术界往往将两者统称为华人，并未对之作严格的区分。



一种观点认为，海外华人是构建中国良好国家形象的重要力量。这一观点获得了中国大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例如一些学者认为，海外华人“是中国软实力构建的独特力量，他们在中国软实力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可以也应该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中华文化的传播、开展民间外交、中国国情和发展模式的宣传介绍以及对中国国家政策和行为的理解、支持和解释等方面，而机制在于通过华侨华人的个人行为方式和方式、海外华人传媒、华文教育以及华侨华人社团等发挥作用”。<sup>1</sup>还有学者提出：“广大华侨华人虽然身居海外，却永怀一颗中国心，对祖国有着深厚的情感、文化认同和思乡恋土情怀，对祖国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日益增强，一心希望祖国统一、兴旺发达。”海外华人是“增进扩大中华文化在全球影响力的积极传播弘扬者和促成中外文明交流沟通的重要桥梁；他们是中国形象的重要表达者与传播塑造者”，也是“向世界解释和宣传中国，发展中外国际民间友好事业，促进国际理解的最好的‘民间大使’”。<sup>2</sup>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东南亚地区华人比其他族裔群体更为积极看待中国；而在华人群体当中，那些从小在家里使用英语的人则要比那些在家里使用汉语的人较少对中国有正面的评价”。<sup>3</sup>这些充分肯定海外华人在构建中国国家形象过程中发挥正面作用的观点已成为中国社会舆论的主流。

相反的声音主要来自海外和港澳地区的学者。澳门学者王建伟、蔡怡宏认为，尽管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但东南亚华人普遍对中国产生疏离感，而中国人“经常以经济优先、功利主义及违反伦理道德操守”的表现导致海外华人的心目中产生了负面的“中国形象”。当这两位学者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知识分子谈论“中国崛起”的形象时，许多人的反应是：中国强大对海外华人没什么好处，为什么要支持中国？<sup>4</sup>王赓武、颜清湟、古鸿廷等学者也强调：华人并非一个整体，他们有阶级的区别、教育的不同、生于中国或居留地的差异，这些因素将导致不同类型的华人对中国的认同存在差异；华人对中国的认同不可高估，随着时间、事件、居留地情势、中国政局的变化，华人对中国的认同也有所变化。<sup>5</sup>在中国利用东南亚华人以提升中国形象和世界影响力的问题上，王赓武并不看好。他指出：“不管中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东南亚的华裔都多半与中国无关，也不是可被中国利用的，相反，有证据显示他们可能是——如果还不是的话——一个相当大的负担。”<sup>6</sup>在谈及海外华人如何适应中国号召建设富强国家的新爱国主义时，他表示：海外华人已成为忠诚的当地国民，他们爱的是本国，而不是中国。他们对中华文化从尊敬到不否定，但却不会积极地去支持和维护。如果本国与中国有冲突，他们可能会尽忠于本国。<sup>7</sup>对于海外华人怀着报效祖国积极回中国投资的说法，马来西亚华裔出身的学者陈志明也不认同。他认为：“即使在经济事务上，如果中国成功地吸引了富有的海外华人去投资，那也是因为这些华人们像别的非华裔投资者（如韩国人、日本人）一样看到了那儿的商机而不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的中国倾向，也不是基于他们的华人情感。”<sup>8</sup>

<sup>1</sup> 陈奕平、范如松：“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作用、机制与政策思路”，《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0年第2期。

<sup>2</sup> 陈正良、薛秀霞、何先光：“析海外华侨华人在推动中国软实力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浙江学刊》2009年第6期。

<sup>3</sup> Zhengxu Wang, Ying Yang, “Is China’s Soft Power Dominating Southeast Asia? View from the Citizens”, *Policy Paper Series* 2008, Issue 44, pp.1-14. *China Policy Institute*, Nottingham: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王正绪、杨颖：“中国在东南亚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基于跨国问卷调查的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5期。王正绪等人的观点仅来自于新加坡一国的数据，难以代表东南亚10国华人的看法。

<sup>4</sup> 王建伟、蔡怡宏：“华人与东南亚国家对华形象——以新马为例”（和谐与共赢：国家软实力及华侨华人的作用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广州，2012年3月，第63页。

<sup>5</sup> 李盈慧：“海外华人认同的三种论述：评颜清湟、古鸿廷、王赓武的三部著作”，台湾《东南亚学刊》2004年第1卷第1期。

<sup>6</sup> Wang Gungwu . “China and the Region in Relation to Chinese Minoritie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No.1 (1979), p.48.

<sup>7</sup> 王赓武：“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王赓武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18页。

<sup>8</sup> 陈志明著，冯光火译：“华裔族群：语言、国籍与认同”，《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引起了我们追寻问题答案的兴趣：海外华人是否会基于其华人情感而对对中国形象有良好的评价？按照第一种观点，这种好评是积极维护中国国家形象和支持中国软实力建设的基础，由于海外华人对中国具有浓厚的情感和向心力，中国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是美好的，因此他们对中国的评价将会优于其他非华人群体。我们试图以此观点为主要研究假设并通过实证分析加以检验。如果海外华人相对于非华人群体对中国形象有更好的评价，则说明他们将成为中国国家形象与软实力构建的较好的支持力量。否则，我们则应慎重评估海外华人对中国国家形象构建和软实力提升的作用。

## 二、方法与资料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方法收集资料。东南亚华人占据全球海外华人的大多数，因此我们首选该地区的华人作为调查对象。鉴于在国外开展问卷调查研究的难度较大，我们选择了留学中国高校的东南亚华裔留学生作为调查对象，试图根据这个特殊的海外华人群体对中国政治、外交、军事、经济以及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评价来了解东南亚华裔青年眼中的中国国家形象<sup>1</sup>。

我们选择两广的高等院校作为调查点。广东和广西分别是中国第一、第三大侨乡，也是中国发展与东南亚关系的前沿地带，是招收东南亚留学生较多的省区，具有较大的代表性。而了解东南亚华裔留学生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评价，一个较好的途径是选择东南亚非华裔留学生作为参照系。因此，问卷调查和访谈对象中包括了来自东南亚的华裔和非华裔留学生。

2011年9月至2012年1月，课题组成员对广西、广东高校的东南亚留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首先，采用判断抽样的方法抽取学校，选取两广留学生较多的15所学校作为样本院校。其次，在选取学校后，采取分层抽样的方法抽取东南亚留学生样本，在样本学校根据东南亚各国留学生在总体中的比例发放问卷。收回有效问卷1189份<sup>2</sup>，其中有1010人回答了是否为华裔，华裔514份，占50.9%；非华裔496份，占49.1%（详见表1）。

表1 东南亚来华留学生问卷调查样本分布

国别	样本总人数(n=)	占总样本量比例 (%)	回答是否华裔样本					
			回答是否华裔人数(n=)	占回答总样本的比例(%)	华裔		非华裔	
					样本数(n=)	占本国样本量的比例(%)	样本数(n=)	占本国样本量的比例(%)
文莱	5	0.4	5	0.4	3	60	2	40
缅甸	56	4.7	52	4.7	41	78.8	11	21.2
柬埔寨	30	2.5	25	2.2	8	32.0	17	68.0
印尼	250	21.1	223	20.0	180	80.7	43	19.3
老挝	67	5.6	41	3.7	18	43.9	23	56.1
马来西亚	120	10.1	119	10.7	117	98.3	2	1.7
菲律宾	27	2.3	27	2.4	21	77.8	6	22.2
新加坡	15	1.3	15	1.3	15	100	0	0
泰国	219	18.4	177	15.8	82	46.3	95	53.7
越南	400	33.6	326	29.2	29	8.9	297	91.1
合计	1189	100.0	1010	100.0	514	50.9	496	49.1

资料来源：两广地区东南亚留学生问卷调查（2011年9月至2012年1月）。

表中未明确是否华裔身份的有179人，占总样本数的15.1%。

<sup>1</sup> 需要注意的是，该调查样本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我们仍不认为应将样本调查的结果推论到整个东南亚华人群体，更不能推论到所有的海外华人。

<sup>2</sup> 本次问卷调查抽取了两广地区的15所学校，共收回东南亚留学生有效问卷1189份，其中广西民族大学118份，广西大学70份，广西医科大学60份，广西中医院7份，广西师范大学183份，桂林理工大学95份，桂林电子科技大学41份，广西南宁华侨中学55份，中山大学125份，暨南大学212份，华南理工大学34份，华南师范大学57份，广州中医药大学98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3份，广州美术学院11份。广西的学校633份，广东的学校556份。

除了开展问卷调查,我们还从填答问卷的被访问者中选取一部分华裔和非华裔留学生进行访谈。在两广地区院校共访问了80多位东南亚留学生、学生干部、老师以及与东南亚留学生有接触的人员,收集了较为丰富的东南亚华裔留学生在华学习生活情况及其对当代中国形象评价的资料。本文对核心议题的分析则主要建立在问卷调查数据、深度访谈资料和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之上。

### 三、东南亚华裔留学生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评价

本文参照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界定的软实力概念及其采用的对一国软实力或国家形象调查的测量方法<sup>1</sup>,从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社会文化5个维度来衡量人们对某一特定国家的国家形象进行评价。这5个维度又分别包含几个具体的测量指标:政治方面包括政府廉洁程度、政府行政效率、人权状况3个指标;军事方面包括军事实力1个指标;外交方面包括干涉别国主权程度、人道主义援助2个指标;经济方面包括产品质量、企业家精神、经济发展前景3个指标;社会文化方面包括国民素质、科技水平、影视音乐文化吸引力3个指标。调查问卷即根据这12个指标设计,每个指标在0-10的范围内打分,除了“干涉别国主权程度”项0分表示不干涉、10分表示干涉非常多之外,其他11项均为:0分表示非常差,10分表示非常好;此外,评价指标中还有就“中国发展对世界的影响”的判断。每一个指标,不仅要求华裔和非华裔留学生对来华前、来华后的中国印象打分,同时还要求对美国、日本、印度及其来源国的印象打分,以便比较东南亚华裔留学生与非华裔留学生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评价是否有差异、两个群体来华前后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是否有变化,以及他们对中国与其他一些国家的国家形象的评价是否存在差异。

问卷数据显示(如图1),东南亚华裔留学生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整体评价,包括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11项指标(不含干涉别国主权项),来华前后有显著差异,来华后的评价低于来华前,来华前后对中国形象的评分均比非华裔留学生给出的分数低,且他们给来源国、美国及日本的评分均高于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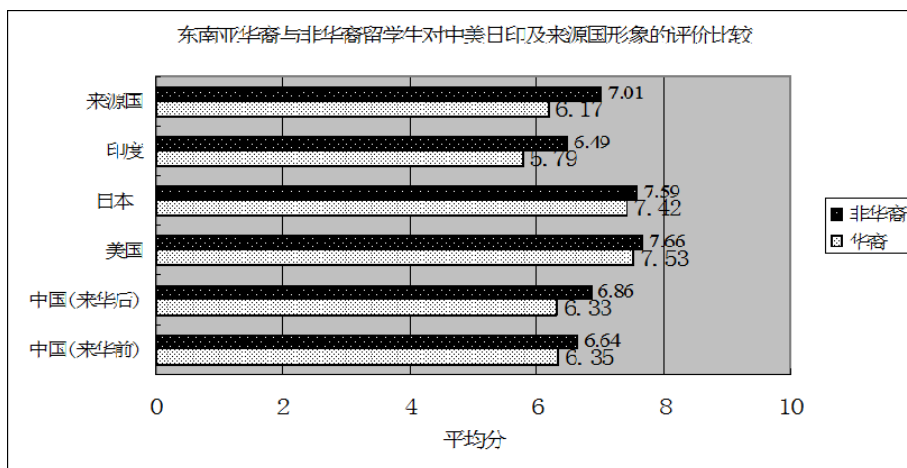


图1 东南亚华裔与非华裔留学生对中美日印及来源国国家形象的评分比较

注:此表是华裔与非华裔留学生对中、美、日、印及来源国的政府廉洁程度、政府行政效率、人权状况、军事实力、人道主义援助、产品质量、企业家精神、经济发展前景、国民素质、科技发展水平、影视音乐吸引力等11项的评分的平均分,不含“干涉别国主权”项。

#### (一) 政治形象

问卷数据显示:东南亚华裔留学生对中国政治形象(包括政府廉洁程度、政府行政效率、人

<sup>1</sup>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Soft Power in Asia*, April 2008.

权状况三个方面)的评分从来华前的5.97分降至来华后的5.50分;无论是来华前还是来华后,华裔留学生的评分均低于非华裔留学生的评分(从来华前的6.37分升至来华后的6.49分),只稍高于其对印度的评分(5.42分),但远低于其对美国的评分(7.23分)和日本的评分(7.20分)。

### 1、关于政府廉洁程度的印象

有498位华裔、471位非华裔东南亚留学生分别对来华前后中国政府廉洁程度的印象评分,统计结果显示:第一,华裔留学生对中国政府廉洁程度的评分,来华前后均比非华裔留学生的评分低,评分从来华前的5.91分降至来华后的5.50分,其中,降幅最大的是马来西亚华裔留学生给出的分数,从来华前的5.36分降至来华后的4.52分,其次是菲律宾华裔留学生给出的分数从5.67降至4.90分。只有新加坡华裔留学生的评分从来华前的4.93分升至来华后的6.00分,越南华裔留学生的评分从来华前的6.44分稍升至来华后的6.57分。而非华裔留学生的评分则从来华前的6.27分升至来华后的6.41。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也显示,两个群体来华前后对中国政府廉洁程度的评价均存在显著差异(p值分别为0.012和0.000)。第二,华裔留学生对中国政府廉洁程度的评分,不仅远低于其对美国的评分(6.88分)和日本的评分(6.85分),而且也低于其对来源国的评分(5.98分),仅高于其对印度的评分(5.16分)。访谈中,华裔留学生对中国政府廉洁状况的评价也较低。广西民族大学汉语硕士泰国华裔陈同学和吴同学(均获中国政府颁发的孔子奖学金)都认为:中国太腐败,政治环境不太理想,毕业后不准备留在中国。

### 2、关于政府行政效率的印象

有499位华裔、469位非华裔东南亚留学生对来华前后中国政府行政效率的印象评分。统计结果显示:第一,华裔留学生来华前后对中国政府行政效率的评分(从来华前的6.23分降至来华后的5.70分)均比非华裔留学生的评分(从来华前的6.56分升至来华后的6.71分)差。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也显示,两个群体来华前后对中国政府行政效率的评价均存在显著差异(p值分别为0.010和0.000)。而且,在华时间越长,华裔留学对中国政府行政效率的评分越低(p值=0.002, Beta=-0.009)。第二,华裔留学生对中国政府行政效率的评分高于对印度的评分(5.55分)和其来源国的评分(5.63分),但远低于对美国的评分(7.29分)和日本的评分(7.39分)。第三,不同国家华裔留学生的评分有所差别。除了老挝华裔留学生的评分从来华前的5.76分升至来华后的6.06分、越南华裔留学生的评分从来华前的6.44分稍升至来华后的6.45分外,其他东南亚8国华裔留学生的评分来华后均比来华前有所下降,其中降幅最大的是马来西亚华裔留学生,其的评分从5.54降至4.50,其次是菲律宾华裔留学生给出的分数从6.10降至5.29,给分最低的是文莱华裔留学生,从来华前的4.67分降至来华后的4.00分。

表2 东南亚华裔与非华裔留学生对中美日印及来源国国家形象评价的差异

被评价国家	中国 (来华前)		中国 (来华后)		美国		日本		印度		留学生 来源国	
	华裔	非华裔	华裔	非华裔	华裔	非华裔	华裔	非华裔	华裔	非华裔	华裔	非华裔
政治形象	5.97	6.37	5.50	6.49	7.23	7.39	7.20	7.39	5.42	6.14	5.95	6.96
军事形象	6.96	7.12	7.18	7.52	8.00	8.09	7.23	7.58	5.94	6.66	5.80	6.82
外交形象:												
干涉别国主权	5.89	6.56	5.93	6.94	7.33	7.47	6.19	6.89	5.36	6.25	5.19	6.27
人道主义援助	6.48	6.64	6.65	6.77	7.25	7.32	7.26	7.54	5.92	6.75	6.44	7.27
经济形象	6.22	6.59	6.33	6.92	7.65	7.85	7.86	7.94	6.26	6.83	6.39	7.03
社会文化形象	6.14	6.47	6.01	6.59	7.53	7.65	7.53	7.49	5.4	6.09	6.25	6.96
总体形象*	6.35	6.64	6.33	6.86	7.53	7.66	7.42	7.59	5.79	6.49	6.17	7.01

注:(1)各项在0-10范围内打分,除“干涉别国主权”项的0分表示没有干涉、10分表示干涉非常多外,其他各项均为0分表示非常差,10分表示非常好。

\* 不含“干涉别国主权”的内容。

### 3、关于人权状况的印象

有 493 位华裔、469 位非华裔东南亚留学生对来华前后中国人权状况的印象评分，统计结果显示：

第一，东南亚华裔留学生与非华裔留学生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评分有明显的差别，华裔留学生的评分无论是来华前还是来华后均明显低于非华裔留学生的评分，从来华前的 5.76 降至来华后的 5.31，而非华裔留学生的给分则从 6.29 升到 6.35。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也显示，两个群体来华前后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评价均存在显著差异（p 值均为 0.000）。而且，华裔留学生在华时间越长，其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评分越低（p 值 = 0.034，Beta = - 0.064）。

第二，东南亚华裔留学生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评分远低于其对美国的评分（7.53分）、日本的评分（7.35分），也低于其对来源国的评分（6.37分），仅比其对印度的评分（5.54分）高。除柬埔寨华裔留学生外，其他东南亚9国华裔留学生来华后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评分均低于其对来源国的评分，甚至曾经历过1998年风暴的印尼华裔留学生对印尼人权状况的评分（6.47分）也高于其对中国的评分（从来华前的6.10分降至来华后的5.67分）；来源于因军人专制而被西方国家制裁的缅甸华裔留学生对缅甸人权状况的评分（5.77分）也高于其来华后对中国的评分（5.60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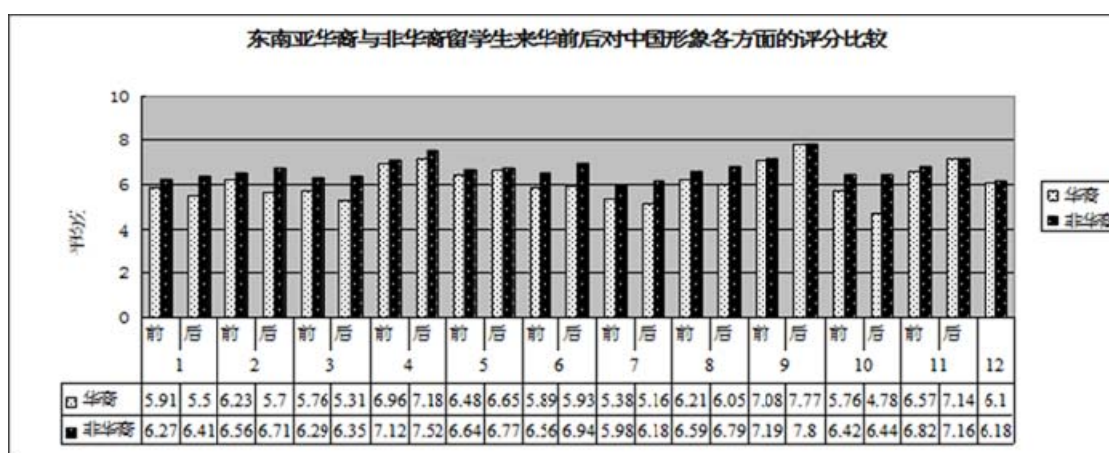


图2 东南亚华裔与非华裔留学生来华前后对中国形象各方面的评分比较

注：（1）除“干涉别国主权”项 0 分表示没有干涉、10 表示干涉非常多外，其他各项 0 分表示非常差，10 分表示非常好。

（2）“前”：指来华前的评价；“后”：指来华后的评分。

（3）图例数字表示测量项目：1=政府廉洁程度；2=政府行政效率；3=人权状况；4=军事实力；5=人道主义援助；6=干涉别国主权；7=产品质量；8=企业家精神；9=经济发展前景；10=国民素质；11=科技发展水平；12=影视音乐吸引力。

（4）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在“来华前对中国军事实力的印象”、“来华前、后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印象”、“来华前、后对中国在贵国的人道主义援助的印象”以及“中国的影视吸引力”等项指标上，华裔与非华裔留学生的评价没有显著差异，sig.(2-tailed)位于 0.166 至 0.900 之间；其他各项指标的 sig.(2-tailed)均小于 0.05，表明华裔与非华裔留学生的评价存在着显著差异。

第三，东南亚10国华裔留学生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评分有些差别，除老挝、越南华裔留学生来华后评分比来华前有所提升（老挝从5.00分升至5.59分，越南均为6.32分）外，其他东南亚8国华裔留学生的评分来华后比来华前均有所下降，其中，马来西亚华裔留学生给分最低，从来华前的 5.16分降至来华后的4.49分，其次是菲律宾华裔留学生给出的从来华前的5.90分降至来华后的5.00分。笔者询问在中山大学攻读汉语专业的菲律宾华裔女研究生：“在民主方面，你认为菲律宾和中国哪个更好？”她说：“菲律宾更自由一点。菲律宾上网没有限制，可以自由发表言论。跟普通原著民一样，华人也可以参加选举。”广州美术学院马来西亚华裔郭同学则说：“在民主自由

方面，马来西亚比中国好，马来西亚言论自由，可选自己的政党，有人敢说话。而这里是共产党领导，有牢骚也不敢说。中国贫富差距太大，马来西亚贫富差距不会像广州这么大，像大学城建设得很漂亮，但周围农村很穷。电视上看到有的地方更穷。而马来西亚没有这么大的差距，对土著人有优惠政策和补助。”

### （三）军事形象

有490位华裔、465位非华裔东南亚留学生对来华前后中国军事实力的印象评分，统计结果显示：第一，两个群体对中国军事实力的评分均较高，华裔留学生评分从来华前的6.96分升至来华后的7.18分。除菲律宾、缅甸华裔留学生的评分来华后比来华前有所下降（分别从6.52分降至6.24分、从7.30分降至7.23分）外，其他东南亚8国华裔留学生来华后对中国军事实力的评分均比来华前有所提升。其中，最高分是新加坡华裔留学生给出的分数，从来华前的7.67分升至来华后的8.40分；最低分是文莱华裔留学生给出的分数，来华前后均为5.33分。而非华裔留学生的评分更高一些，从来华前的7.12分升至来华后的7.52分。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来华前两个群体对中国军事实力的评价没有显著差异（p值为0.166），但来华后的评价有显著差异（p值为0.004）。

第二，对中国军事实力来华前后的评分，东南亚10国华裔留学生均高于其对印度（5.94分）和来源国（5.81分）的评分，但低于其对日本（7.23分）和美国（8.00分）的评分，在他们看来，中国拥有较强的军事实力，且呈不断增强之势，但与美国和日本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美国仍是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非华裔留学生的看法基本类似。

### （四）外交形象

关于外交形象，主要从干涉别国主权和人道主义援助两个方面来测量。

#### 1、关于干涉别国主权方面的印象

有487位华裔、448位非华裔东南亚学生对来华前后中国干涉别国主权的印象评分，统计结果显示：第一，华裔留学生对中国干涉别国主权的评分从来华前的5.89分升至来华后的5.93分，除文莱、泰国华裔留学生对中国干涉别国主权的印象来华后比来华前有所好转外，其余各国华裔留学生来华后的印象均变差。而非华裔留学生则从来华前的6.56分升至来华后的6.94分。两个群体对中国干涉别国主权的评价来华后均比来华前差。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也显示，来华前后两个群体对中国干涉别国主权的评价均有显著差异（p值均为0.000）。第二，华裔留学生对中国的评分低于其对美国的评分（7.33分）和日本的评分（6.19分），但高于其对印度（5.36分）和来源国（5.19分）的评分；而非华裔留学生来华后对中国的评分低于对美国的评分（7.47分），高于对日本（6.89分）、印度（6.25分）和来源国（6.27分）的评分。这表明，在华裔留学生眼中，中国干涉别国主权比美国和日本少，但比印度和来源国多；而非华裔留学生认为，中国干涉别国主权比美国少，但比日本、印度和来源国多。

#### 2. 关于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的印象

在问卷，“人道主义援助”即“当某个国家有灾难时，其他国家给予这个国家医疗、食品等人力、物力方面的援助”。有489位华裔、447位非华裔东南亚留学生对来华前后中国人道主义援助的印象评分，统计结果显示：第一，华裔留学生和非华裔留学生对中国人道主义援助的评分来华后比来华前均有所提高，分别从6.48分升至6.65分、6.64分升至6.77分，华裔留学生评分稍低于非华裔留学生的评分。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来华前后两个群体对中国人道主义援助的评价不存在显著差异（p值分别为0.199和0.366）。除新加坡和菲律宾华裔留学生来华后比来华前的评分有些下降（分别从6.20分降至5.60分、从6.24分降至6.10分）外，其他东南亚8国华裔留学生来华后的评分均比来华前高些，对中国人道主义援助的评价比较正面。其中，缅甸华裔留学生给分最高（从来华前的8.05分升至来华后的8.33分），其次是柬埔寨华裔留学生的给分（来华前后均为7.83分），与中国在缅甸、柬埔寨进行的人道主义援助呈正比。第二，在华裔

留学生眼中，美国和日本的人道主义援助比中国做得好（评分分别是7.25分，7.26分），也比印度和来源国做得好（评分分别是5.92分、6.44分）。

## （五）经济形象

关于经济形象，从产品质量、企业家精神和经济发展前景三个方面来测量。

### 1、关于产品质量的印象

产品质量是一个国家经济形象的重要表现，它既是硬实力，也是软实力。有493位华裔、470位非华裔东南亚留学生对来华前后中国产品质量的印象评分，问卷数据显示：第一，华裔留学生对中国产品质量评分来华后比来华前差（从5.38分降至5.16分），且在华时间越长评分越低（ $\text{Sig} = 0.000$ ， $\text{Beta} = -0.125$ ）。而非华裔留学生的印象来华后比来华前的评价稍有改善（从5.98分升至6.18分）。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也显示，来华前、后两个群体对中国产品质量的评价均存在显著差异（p值均为0.000）。

第二，华裔留学生对中、美、日、印和来源国产品质量的评分排列是：日本的产品质量最好（8.20分），其次是美国（7.88分），再次是来源国（6.42分）和印度（6.09分），评分最低的是中国。

调查要求留学生列出中国目前亟需改善的方面，被调查对象均不约而同地将中国产品的“质量”列入其中。暨南大学缅甸华裔某同学说：“虽然缅甸产品科技含量不高，但很耐用。在缅甸销售的中国产品虽然很便宜，但用一段时间就坏了，而日本产品虽然价格贵一点却很耐用，所以，缅甸居民大件家电一般买日本产品，有钱一点的家庭也一般用日本和泰国产品，只有那些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才喜欢买中国产品。在我的家乡，日本援助修建的一座桥梁很牢固，而中国援助修建的一条公路，通车才几个月就要修补了，因为沙子上面铺的水泥比较少。”同校泰国华裔黄同学说：“在泰国随处可见中国制造的物品，价钱便宜，也很实用，质量也可以，主要是衣服、鞋子等日常用品，不过给人的感觉就是处于低端的产品；如果要买高档一点的，一般都买日货、韩货、美国货，但是平时买的用的还是中国货比较多。”同校印尼某同学称：“来中国之后就一直用中国产品。不过中国产的牛奶不是很好。我一直喝国产的，每次回家都会带来，同学喝了也觉得还是印尼的比较好。至于服装，印尼的比较耐用些，中国的很容易烂。家用电器日本的比较好，我妈的一个朋友卖了长虹电视机，用了不到半年就坏了，但我家跟她同时买的那台日本电视机，一直用到现在”（2011年11月杨焕斌访问）。老挝华裔同学阿宝说：“中国产品分好多个等级，在老挝，同样低价钱的衣服，中国产的质量要比泰国产品要差很多，但是贵的衣服，质量就好很多。”非华裔留学生也有同样的印象，来自越南胡志明市的广西中医学院范同学说：“中国产品广告虚假，出口的也有不好的。中国的水果农药太多，好看但不好吃。而越南的水果虽然不好看，但很甜很好吃。”（2011年9月邓禹、李钊访问）

第三，尽管东南亚华裔留学生对中国产品质量的评分普遍较低，但不同国家学生的评价也有差别。其中，评价最低的是文莱华裔留学生（从来华前的4.33分降至来华后的4.00分），其次是菲律宾（从4.86分降至4.05分）、马来西亚（从4.73分降至4.25分）、新加坡（从5.33分下降至4.40分）、越南（从6.04分升至6.08分）和柬埔寨（从6.50分降至6.00分）。总的来看，中南半岛国家华裔留学生对中国产品质量的评分比东南亚海岛国家华裔留学生的评分高些，这可能与其母国经济发展水平和融入世界经济程度有关。

当然，也有不少华裔留学生喜欢中国产品。一位暨南大学马来西亚华侨学生干部常在网上买搞活动用小礼品，称中国的“网购”很好，可选择的東西很多，既方便又便宜。2011年12月，调查者在暨南大学华文学院遇到两位老挝华裔留学生在淘宝网购买鞋子和小礼品，准备带回国作礼物。

### 2、关于企业家精神方面的印象

良好的企业家精神包括创新、拼搏、诚实、守信等方面。有489位华裔、464位非华裔东南亚留学生对来华前后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印象评分, 问卷数据显示: 第一, 华裔留学生对中国企业家精神的评价来华后(6.05分) 差于来华前(6.21分), 且在华时间越长给分越低(Sig = 0.003, Beta = -0.088)。而非华裔留学生的评分来华后(6.79分) 好于来华前(6.59分)。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 来华前、后两个群体对中国企业家精神的评价均有显著差异(p 值分别为 0.004 和0.000)。第二, 在华裔留学生对中、美、日、印及来源国企业家精神的评分中, 日本分最高(7.66分), 其次是美国(7.43分), 再次是来源国(6.48分)和印度(6.16分), 中国企业家得分最低, 这与对中国产品质量的评分是一致的。

广西民族大学泰国华裔吴同学说:“中国出口的产品以盈利为第一, 而不考虑质量。出口泰国的一些农具质量差, 一般是卖给贫穷一点的农民, 而富有一点的人买日本或台湾产的农具。中国有很多盗版的手表和包包, 且要价很高, 我曾经将一款包包从2400元讲价到400元”(2011年9月邓禹访问)。第三, 来自不同东南亚国家的华裔留学生对中国企业家精神的评分有所不同。除了缅甸、越南和泰国华裔留学生对中国企业家精神的评价来华后好于来华前(分别从6.97分升至7.00分、从6.12分升至6.41分、从5.96分升至6.04分), 老挝华裔留学生来华前后评分持平(6.29分), 其他国家华裔留学生的评分来华后都比来华前有所下降, 其中, 文莱华裔留学生的评分(从5.67分降至4.67分)降幅最大, 其次是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柬埔寨华裔留学生的评分(分别从5.67分降至5.05分、从5.59降至5.33分、从6.83分降至6.17分)。总体上看, 中南半岛国家华裔留学生对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印象好于东南亚海岛国家华裔留学生的印象。

### 3、关于经济发展前景的印象

有490位华裔、466位非华裔东南亚留学生对来华前后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印象打分, 问卷数据显示: 第一, 华裔和非华裔留学生亲眼目睹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评价来华后好于来华前(分别从7.08分升至7.77分、7.19分升至7.8分)。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 来华前、后两个群体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评价没有显著差异(p 值分别为0.348和0.785)。第二, 华裔留学生来华后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评分均高于其对印度(6.54分)、美国(7.65分)、日本(7.71分)及来源国(6.27分)的评分。第三, 东南亚10国华裔留学生来华后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评分均高于7分, 其中柬埔寨华裔留学生给出最高分(来华前后均为8.33分), 给分最低的是文莱华裔留学生(从来华前的6.00分升至来华后的7.00分)。这表明, 东南亚华裔留学生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均持比较乐观的态度。

暨南大学缅甸华裔杨同学亦称:“中国发展实在太快。刚来时, 华文学院附近还是荒野, 但亚运会前后建起了许多大楼和设施。以前知道中国发展快, 但没想到有这么快, 发展速度真是惊人。”此外, 有240位即47%的华裔留学生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快, 来华留学对自己事业发展有利”是来华留学的主要原因; 而非华裔留学生有184位即37.6%作了肯定的回答, 比华裔留学生低了1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 东南亚华裔留学生比非华裔留学生更看重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形势, 来华留学对自己和家庭事业有较好的发展预期。柬埔寨华裔黄同学在谈起他为何选择到中国留学时说:“父母和我都认为, 要出国留学只去两个大国——美国和中国。两国相比, 美国上升幅度不会太大, 而中国上升幅度会很大, 留学中国可以了解中国, 中国市场很大, 以后柬埔寨与中国经贸关系会很有潜力, 所以我来中国留学。”

## (六) 社会文化形象

关于社会文化形象, 从国民素质、科技发展水平和影视音乐文化吸引力三个方面来测量。

### 1、关于国民素质的印象

有489位华裔、455位非华裔东南亚留学生对来华前后中国国民素质的印象评分, 问卷数据显示: 第一, 华裔留学生对中国国民素质的评分来华后明显低于来华前(从5.76分降至4.78分),



且在华时间越长评分越低 ( $p$  值= 0.000,  $Beta$ = -0.166)。而非华裔留学生对中国国民素质的评分高于华裔留学生,从来华前的6.42分稍升至来华后的6.44分。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来华前、后两个群体对中国国民素质的评价均有显著差异 ( $p$ 值均为 0.000)。第二,在华裔留学生对中、美、日、印和来源国国民素质的评分中,中国国民素质得分最低。除了越南华裔留学生的评分来华后稍好于来华前(从 6.88分升至 6.96分)外,其他东南亚 9 国华裔留学生来华后的评分均比来华前有所下降。其中,给分最低的是菲律宾华裔留学生(来华前 4.95分,来华后 3.62分);来华前后评分降幅最大的是马来西亚华裔留学生(从来华前的5.05分降至来华后的 3.89分)。其次是印尼、新加坡、老挝华裔留学生的评分(分别从 6.46分降至 5.13分、从5.73分降至4.60分、从 5.31分降至 4.44分)。降幅较小的是缅甸和泰国华裔留学生的评分(分别是 6.10分降至 5.59分、从 5.01分降至 4.49分)。总的来看,东盟老成员国(新、马、印尼、泰、菲和文莱)华裔留学生对中国国民素质的评分明显低于东盟新成员国(越、老、柬、缅)华裔留学生的评分。

一位在中山大学攻读汉语专业的菲律宾华裔研究生说:“中国人爱插队。坐地铁时,车上的人还没下来,就抢着上车了。有的地方不干净,如吃饭的地方不太讲究卫生。在菲律宾也只有唐人街有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老一辈华人可能还不太讲卫生,但青年华人已经很讲卫生,主要是菲律宾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暨南大学泰国华裔黄同学说,“来到中国后发现人们有一些不太文明的行为,我不太习惯。比如说话声音很大,人多推撞,随地吐痰,厕所有异味,比较难受。最不习惯的就是这里的服务态度,感觉非常不好。比如去银行办个卡,你有什么不懂的地方问那些职员,他们都不太想理你,在超市买东西也是一样。我此前去过香港,感觉就是天差地别。我发现香港的乞丐也是很有秩序的,他们不会向你讨钱,即使你给他,他也不要,而在这边经常会有乞丐乞讨,这和政府的福利政策是相关的,香港做得很好。当然,可能中国大陆人太多,政府也很难照顾得了那么多。总之,就是觉得中国发展得太快,进入一个新时代,但人好像还没跟上,可能上一代人就是这样,不过年轻一代会好很多,相信再过二三十年会不一样。”广州中医药大学马来西亚华裔某同学说,“中国普通老百姓不太讲卫生。但有一次,我亲眼见到一位主任医生在广州大医院的大厅里随地吐痰,连高级知识分子都不讲卫生,这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华文专业的马来西亚华裔硕士说得更为生动:“有一次留学生与中国大陆同学聚会,一位大陆男生竟将长长的鼻涕挂在树上,实在太不可思议了。为什么不问同学要手纸呢?”还有的华裔留学生遇到小偷、被骗的情况。暨南大学一位缅甸华裔留学生刚到广州时,曾接到一个电话请他汇款到某个账户上,他老老实实地将钱汇到电话所报的账户上,后来才发现是被骗了。

## 2、关于科技发展水平的印象

有494位华裔、463位非华裔东南亚留学生对来华前后中国科技发展水平的印象评分,问卷数据显示:第一,华裔留学生对中国科技发展水平的评分,来华后(7.14分)比来华前(6.57分)高,而且与非华裔留学生的评分差别不大(从来华前的6.82分升至来华后的7.16分)。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来华前两个群体对中国科技发展水平的评价有显著差异( $p$ 值为 0.033),而来华后两个群体的评价没有显著差异( $p$ 值为 0.900)。第二,在华裔留学生对中、美、日、印和来源国的科技发展水平的评分中,印度得6.34分,来源国得6.08分,日本得8.30分,美国得8.21分。在华裔留学生看来,中国的科技水平虽比印度和留学生来源国高,但比日本、美国仍差一大截。

## 3、关于影视音乐文化的吸引力

一国的影视音乐文化及其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国的文化和价值理念,其产品是否受欢迎也是衡量其文化和价值观是否受欢迎的一个指标。关于中、美、日、印及留学生来源国的影视音乐吸引力问题,只有广东7所学校的526位东南亚留学生(其中408位华裔,118名非华裔)进行了评分,根据问卷数据统计结果和访谈资料,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华裔留学生对中国影视音乐吸引力的评分（6.10分）稍低于非华裔留学生的评分（6.18分），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也显示，两个群体对中国影视音乐文化吸引力的评价没有显著差异（p 值为 0.758）。暨南大学汉语专业的泰国华裔黄同学称：“以前在泰国因不懂中文，不怎么看中国的节目。但我爸爸很喜欢看一些中国的电视剧，尤其喜欢看像《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代剧，觉得它们制作得很细致。我来到中国后，也看了很多电视节目，接触到很多不同的文化。上网看一些中国电视剧、电影、娱乐节目，也会听中文歌。如看过‘非诚勿扰’的相亲节目，发现在中国家长会和他们的孩子一起上节目相亲，这在泰国是比较少见的。”广西民族大学汉语专业硕士泰国吴同学说：“喜欢看中国的电视剧，《还珠格格》、《天龙八部》等。也看一些娱乐节目，比如‘快乐女声’，中国目前的女性都走中性化的路线，比较流行中性的风格。”（2011年9月邓禹、李钊访问）

第二，华裔和非华裔留学生对中、美、日、印及其来源国的影视音乐吸引力的评分比较接近，他们最喜欢美国影视音乐产品（评分分别是 7.37 分和 7.49 分），其次是日本（分别给了 6.97 分和 6.65 分）和来源国（分别给了 6.04 分和 7.06 分），印度得分最低（分别给了 4.08 分和 4.88 分）。而对来源国影视音乐产品的喜好，非华裔留学生比华裔留学生的给分要高出近 1 分，说明非华裔留学生作为原著居民更喜爱本土文化产品；而华裔留学生更喜欢西方文化产品。暨南大学印尼华裔王同学对笔者说：“我首先喜欢看日本动漫，如《火影》等；其次是美国电影，一般在电脑上下载看，也喜欢看韩剧。而中国的动漫不好看，看过一点《喜洋洋》。不喜欢看印尼的电视剧，太长，不紧凑。”

第三，东南亚 10 国华裔留学生对中国影视音乐吸引力给分高低不同。其中，给分最低的是马来西亚华裔留学生（4.90 分），其次是新加坡华裔留学生（5.92 分），可见这两个保持中国传统文化最多的华族学生群体反而对中国影视音乐的评分低于其他东南亚国家华裔留学生；而文莱和缅甸华裔留学生的给分较高（分别为 7.33 分和 7.13 分）。

### （七）关于中国发展对世界的影响

对于中国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国持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中国的发展可以促进地区和世界的稳定与发展，但也有猜疑和担心，西方国家以及一些同中国有竞争关系的国家的新闻媒体甚至不断宣传“中国威胁论”。而留学中国的东南亚华裔留学生，经过在中国学习生活一段时间后，他们就中国发展对世界的影响持什么看法呢？我们的调查结果是：

第一，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的影响”问题，在 514 位被访的华裔留学生中，38.9% 的人认为起“稳定作用”，16% 的人认为是“威胁作用”，40.7% 的人选了“不好说”，23 人（4.5%）没有回答。有 496 位非华裔留学生亦填答了此问题，其中，32.3% 的人认为起“稳定作用”，15.7% 的人认为是“威胁作用”，46% 的人选了“不好说”，有 30 人（6.0%）没有回答。这些结果说明，东南亚华裔留学生在对中国发展对世界的影响问题上，比非华裔留学生持有较为正面的看法。

第二，东南亚不同国家的华裔留学生就中国发展对世界影响的看法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印尼华裔留学生中有 46.1% 的人认为起“稳定作用”，是东南亚 10 国华裔留学生中比例最高的；马来西亚华裔留学生也有 39.3% 的比例。认为中国发展对世界起“威胁作用”比例较高的国家华裔留学生有老挝（27.8%）、柬埔寨（25%）、越南（24.1%）。选择“不好说”超过 50% 的有文莱（100%，个案数少于 5 个）、柬埔寨（50%）、缅甸（51.2%）、新加坡（60%）等国华裔留学生，“不好说”既有可能变为“稳定作用”，也有可能是“威胁作用”，一旦有什么突发事件，也许该比例就会改变。在访问中，东南亚华裔留学生关于中国发展对世界的影响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广西民族大学的泰国华裔（祖籍广东汕头人）吴同学说，“中国发展起来会对世界有威胁作用，因为中国政府对国民的福利较差，所以发展后也不会对世界人民起更好的作用。”而暨南大学的印尼华裔王同学说，“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的影响应该是稳定作用，就自己的感觉来看，

中国不会称霸，不会对世界构成威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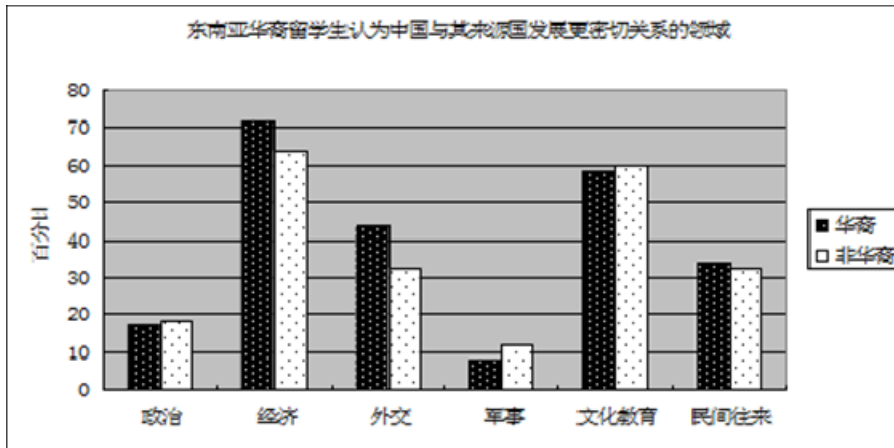


图3 东南亚华裔留学生认为中国与来源国发展更密切关系的领域

### (八) 关于中国与来源国关系的发展预期

关于中国与华裔留学生来源国的关系发展预期，有495位华裔留学生回答了此问题，其中，有71.9%的人认为在经济方面，58.2%的人认为在文化教育方面，43.6%的人认为在外交方面，34.1%的人认为在民间交往方面，17.0%的人认为在政治方面，7.7%的人认为在军事方面。与此相对，非华裔留学生的比例分别是63.7%认为在经济方面，59.7%的人认为在文化教育方面，32.5%的人认为在民间交往方面，32.3%的人认为在外交方面，18.1%的认为在政治方面，11.9%的人在军事方面，中国与来源国可以发展更为密切的关系。两个群体对中国与其来源国关系的发展预期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华裔留学生比非华裔留学生更看好中国与来源国的经济和外交关系，而对中国与来源国的政治、军事关系的发展预期，华裔留学生比非华裔留学生较为保守。

## 三、 影响东南亚华裔留学生对中国形象评价的因素

我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模型分析了影响东南亚华裔留学生来华后对中国形象评价的因素。因变量是留学生对中国形象的评价，均以0—10分表示，属于定比变量或连续变量。评价的项目分别是：政府廉洁、政府效率、人权状况、国民素质、产品质量、企业家精神，总体形象则是对上述各个项目评价分值的加总。

表3 影响东南亚华裔留学生来华后对中国形象评价的因素

	政府廉洁	政府效率	人权状况	国民素质	产品质量	企业家精神	总体形象
性别（虚拟，男=1）	.051	.067	.083	.163***	.046	.077	.106*
已经在中国的时间	-.078	-.036	-.106*	-.131**	-.119**	.003	-.105*
获得中国奖学金（获得=1）	-.003	-.002	.003	.071	.001	.037	.027
汉语水平	.000	-.102*	.032	.130**	.025	.008	.017
是否与中国学生同住（是=1）	-.086	-.156***	-.133**	-.071	-.119**	-.169***	-.156***
是否参加校学生会（是=1）	.010	.039	.092 *	.033	.083	.046	.062
N（样本量）	514	514	514	514	514	514	514
F	1.16	3.08	2.87	3.84	2.41	2.19	3.33
R Square	.019	.049	.046	.061	.039	.036	.056

注：\*\*\* p < 0.01, \*\* p < 0.05, \* p < 0.10。

表3的数据表明,在东南亚华裔留学生中,与女生相比,男生倾向于对中国的总体形象、国民素质给予较好的评价。东南亚华裔留学生到达中国的时间(以来华的年数为计)越长,就越倾向于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国民素质、产品质量和中国的总体形象等给出较低的评分,尤其是对国民素质和产品质量的评价较低,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 $-0.131$  ( $p<0.05$ )、 $-0.119$  ( $p<0.05$ )。值得一提的是,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东南亚华裔留学生与未获得者对中国形象的评价没有差异,换言之,东南亚华裔留学生不会因为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奖学金而对中国形象有较好的评价。汉语水平(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的不同,也会影响东南亚华裔留学生对中国某些方面形象的评价。例如,汉语水平越高,对中国国民素质的评价越高、对中国政府行政效率的评价越低,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 $-0.130$  ( $p<0.05$ )、 $-0.102$  ( $p<0.10$ )。与中国学生同住一室的华裔留学生倾向于对中国形象给出较低的评价,数据显示,曾与中国学生同住的华裔学生比起那些从未与中国学生同住的华裔学生,对中国总体形象、中国政府行政效率、中国的人权状况、产品质量和企业家精神等的评价明显较低。而东南亚华裔留学生是否参加学校的学生会组织,与他们对中国形象的评分没有明显的关系(详见表3)。

#### 四、 结论与讨论

以上对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了检验,结果如下:

1. 在对中国的政府廉洁程度、政府行政效率、人权状况、军事实力、人道主义援助、经济发展前景、产品质量、企业家精神、科技发展水平、国民素质、影视音乐吸引力等11个方面的评分中,东南亚华裔留学生来华前后的评分均低于非华裔留学生的评分。而东南亚华裔留学生对中国在不干涉别国主权方面的评价好于非华裔留学生的评价,他们认为“中国发展对世界的影响”起“稳定作用”的比例高于非华裔留学生。

2. 东南亚华裔与非华裔留学生对中、美、日、印和来源国的国家形象的总体评分排序相似,美国得分最高,其次是日本,第三是其来源国;中国居第四位,仅比其对印度的评分高。

3. 东南亚华裔留学生来华后,对中国政府廉洁程度、政府行政效率、人权状况、企业家精神、产品质量、国民素质等方面的印象均比来华前差,尤其是国民素质、政府行政效率、人权状况等方面的评分降幅较大,且在华时间越长评分越低,在中国越久越不喜欢中国的影视音乐,这些均属于软实力范畴。而对中国的军事实力、人道主义援助、经济发展前景、科技发展水平等硬实力方面,华裔留学生和非华裔留学生来华后的印象均好于来华前,有比较一致的看法。也就是说,华裔留学生了解真实的中国社会后,对中国硬实力方面的印象都会向好的方面转变,而他们对软实力方面的印象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变差了。另外,东南亚华裔留学生是否获得中国奖学金与其对中国的国民素质、人权状况、产品质量、政府廉洁程度、政府行政效率、中国发展对世界的影响等方面评分高低的相关性并不显著,也就是说,华裔留学生并不因获得中国奖学金而比未获得者对中国这些方面有更积极的评价。

4. 来自东南亚10国华裔留学生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识略有不同。总体上看,来自中南半岛国家的华裔留学生比来自海岛国家的华裔留学生的评分高一些。马来西亚华裔留学生对中国的总体评分最低,他们大都除了中国发展对世界的影响、中国科技水平、经济发展前景、人道主义援助、军事实力等硬实力的评分来华后比来华前有些许提高外,对中国其他方面的评分来华后均低于来华前,分数也较低。而且,这一类被调查者大都能讲较流利的中文,保持较多的华人特性和中国传统文化。新加坡、菲律宾华裔留学生的评分也有类似的情况。

总之,东南亚华裔留学生对中国的总体评价比非华裔留学生的评价差,相对于来华前的印象,来华后他们对中国软实力方面的印象反而变差。这一总体结果与王正绪等一些学者的观点相反。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结果,我们认为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东南亚华裔留学生由于来华前后了解中国的途径不同，从而形成印象上的显著落差。到中国留学之前，东南亚华裔留学生主要通过间接渠道了解中国，因此获得相对“比较美好”的中国印象。问卷数据显示，在华裔留学生来华前了解中国的途径（此题为多选题，各项百分比相加会超过100%）中，有55.5%的人通过亲朋好友口述了解中国，52.7%的人通过电影、电视剧了解中国，41.8%的人通过学校教学了解中国，40.4%的人通过大众传媒（报刊、电视、网络等）了解中国，20.9%的人通过书籍了解中国，13.9%通过当地中国游客了解中国，通过其他方式了解中国仅有3.7%。访问所得信息与问卷统计结果相符。广州美术学院的马来西亚华裔郭同学称：“我家订有华文报刊，所以得以经常阅读华文报刊。”来自印尼、马来西亚、缅甸、老挝、菲律宾的华裔留学生称，他们在母国上华文学校和孔子学院，开设中国历史地理课程，了解到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可见，东南亚华裔留学生来华前在心目中构建了中国是经济快速发展的文明国家形象，主要是通过电影电视、亲朋好友口述、学校教学和其他大众传播渠道获得的。

东南亚华裔留学生来华后通过什么途径了解新闻信息？（此题亦为多选题，各项百分比相加会超过100%）问卷数据显示，东南亚华裔留学生在华期间，有50.6%的人通过中国网页，33.7%的人通过中国电视，33.1%的人通过室友同学，30.2%的人通过母国网页，29.4%的人通过上课，24.7%的人通过父母亲朋，11.5%的人通过母国电视，15.0%的人通过中文报刊，10.7%的人通过港台电视报刊，5.6%的人通过其他方式了解新闻信息。可见，中国网页是东南亚华裔留学生在华期间了解新闻信息的最主要渠道；其次，中国电视、室友同学、课堂教学等也是华裔留学生了解新闻的主要渠道。但是，在通讯、网络发达的今天，华裔留学生来源国对他们仍有重要影响，来源国网页、父母亲朋也是华裔留学生了解新闻信息不可忽视的重要渠道。总之，华裔留学生来华后，有了更多的机会与中国社会产生“零距离”接触，他们主要通过中国传媒了解中国信息。但亲眼目睹中国实际情况后，对中国形象软实力方面的评价却有所变差，这一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第二，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及与中国的关系也影响着华裔留学生对中国的评价。海岛国家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多，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而中南半岛国家虽与中国传统关系较好，受中国影响较多，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仍较低，这些都成为影响华裔留学生对中国国家形象评价的因素。

第三，中国在对外宣传中构建的中国形象可能与现实中的中国形象存在一定的差距。很多东南亚华裔留学生在来源国的华文学校和孔子学院学习过中国历史文化，来华前心目中构建的中国形象是“礼仪之邦”，但来华之后，感到真实的中国与想象的中国有差距。暨南大学的柬埔寨华裔黄同学亦称：“在来中国之前，我主要从台湾的电视剧、电影以及大陆的古代剧了解中国，以为中国很文明，但来到中国之后，感觉还是有差异，比想象中的差了一些。”

综上所述，本调查研究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作为东南亚华人华侨的代表群体，东南亚华裔留学生是海外华人中对了解中国较多、并愿意在中国接受教育的群体，但并不因其具有中国血统、保持较多中国传统文化、能流利地使用中文而比非华裔留学生对中国国家形象有更积极的评价。针对这一情况，就整个东南亚华人群体是否能在传播和构建中国良好形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问题，应进一步深入研究。二是东南亚华裔留学生来华前主要通过电影电视、亲朋好友口述、学校教学和其他大众传播渠道了解中国，来华后对中国软实力方面的评价变差。这一客观现实给我们的启示是：中国的对外宣传应该全面、客观，把中国好的、不好的方面都展示给世人，以构建一个真实、全面的中国国家形象。当然，中国在改善环境、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企业家社会责任、提升国民素质等方面也须做出更多努力。当然，我们的样本仅源于两广地区院校，还不能完全代表来华留学的华裔留学生以及海外华人整体，这一结论仍需进一步检验，希望更多有兴趣的学者在其他地区做更细致的调查研究。

## 【论 文】

# 藏族大学生就业意向问卷调查报告

本调查由《雪子》杂志社组织，刊载于《雪子》第十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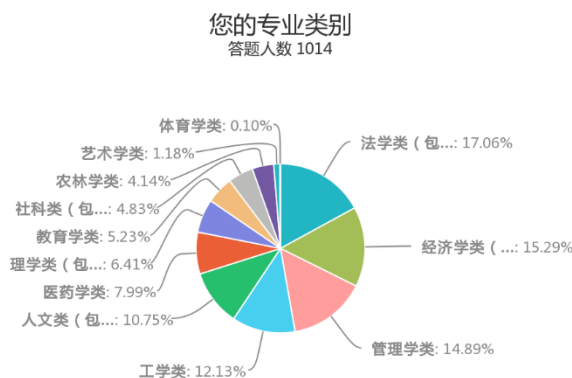
### 问卷概况

2014年10月，《雪子》杂志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关于藏族大学生就业意向的网络问卷调查，旨在分析当前藏族大学生的就业观念及就业影响因素。本次问卷调查样本容量为1014人。需要指出的是，本调查因采取社交网络传播的形式，填写该问卷的学生大多来自西藏自治区，且大多数学生都是内地重点大学的学生。其他四省藏区的学生，西藏本地大学生和专科院校大学生占极少数，因此样本选择仍欠科学性，这也是造成这份问卷有一定局限性的原因。

该问卷调查内容涉及藏族大学生的择业意向，对自身就业前景的态度，对就业地点的选择等一系列问题，期望通过多个角度整体分析当前藏族大学生对就业问题的基本看法。

### 调查对象概况

问卷调查对象包括来自西藏、四川藏区、青海藏区、云南藏区、甘肃藏区的藏族学生共计1014人，其中94.78%来自西藏自治区。调查对象中68.93%是内地西藏班毕业生，在重点大学就读的学生占74.85%，普通大学学生占21.01%，专科院校学生占4.14%。在1014位受访者中，共有研究生27人，其中硕士20人，博士7人。在专业方面，59.37%的调查对象学习法学类、经济学类、管理学类和工学类这四个专业，各专业具体所占比重请参考（图1）。有8.78%的人表示对目前所学专业不满意，对专业的满意程度一般的学生占28.73%，而62.48%的学生表示对目前专业满意。



(图1)

### 主体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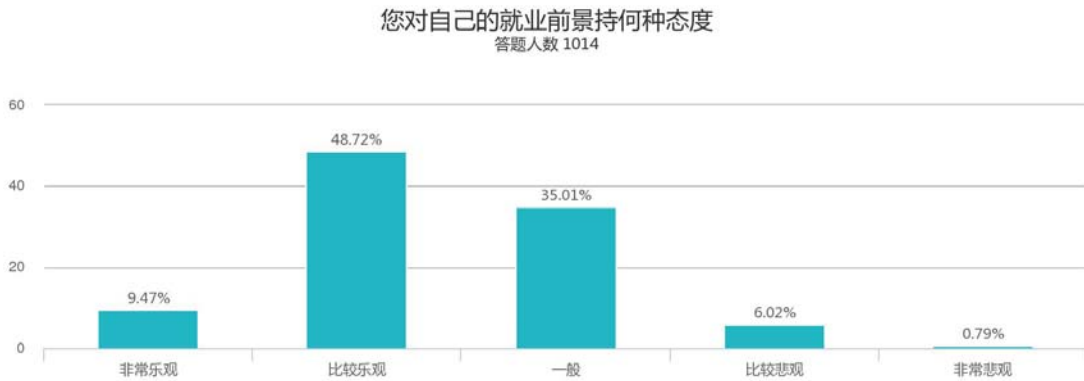
#### 1、对自身的就业问题的考虑

中，54.64%的学生表示经常考虑自己的就业问题，43.98%的学生表示偶尔会考虑就业，仅1.38%的学生表示从未考虑自己的就业问题。不难发现，大多数人对自己未来的就业比较关注。就业是大学生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有较早的思考和准备对真正踏入社会必然有所帮助。

#### 2、对自己就业前景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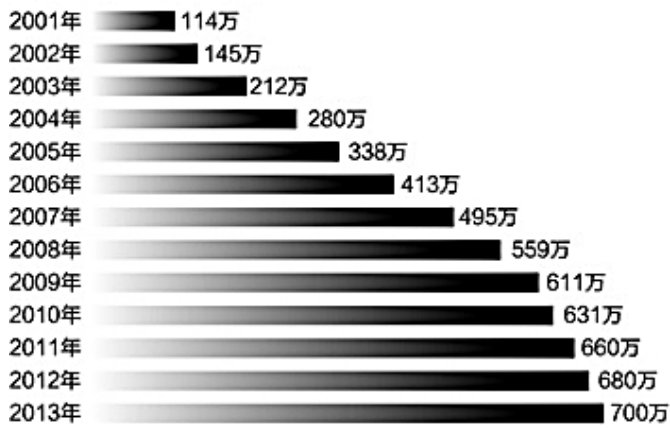
如图2所示，接受本次调查的藏族学生中，58.19%对自己的就业前景持乐观的态度。随着高校毕业生人数不断增多（图3），就业形势也愈发严峻，藏族大学生也不可避免地加入到了激烈的竞争中。专业是影响学生对自己就业前景评估的因素之一，相对农林学类和工学类的学生而

言，专业为法学类、医药学类和人文类的学生表示对就业前景更加乐观。



(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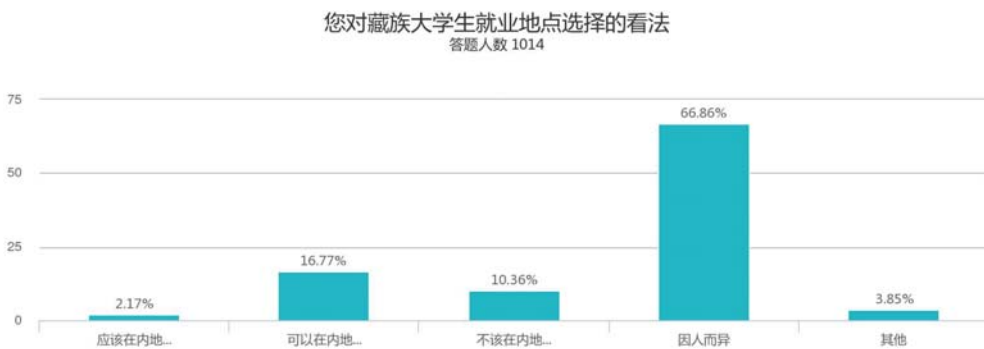
### 近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



(图 3) 本图片来源: [http://www.hujiang.com/dxsjy\\_s/p590025/](http://www.hujiang.com/dxsjy_s/p590025/)

### 3、对藏区整体就业形势的看法

调查显示 10.55% 的学生认为目前藏区就业形势不太乐观，而 46.54% 则认为就业形势良好。以西藏为例，据中国西藏网报道，2013 年西藏新增就业 2.8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2.5% 以内。13243 名高校毕业生就业，就业率达到 99%，实现了“西藏籍应届高校毕业生全就业、往届毕业生基本就业”的目标。在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税费减免、小额担保贷款、就业创业奖励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下，目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稳定。未来几年也有维持目前状况的态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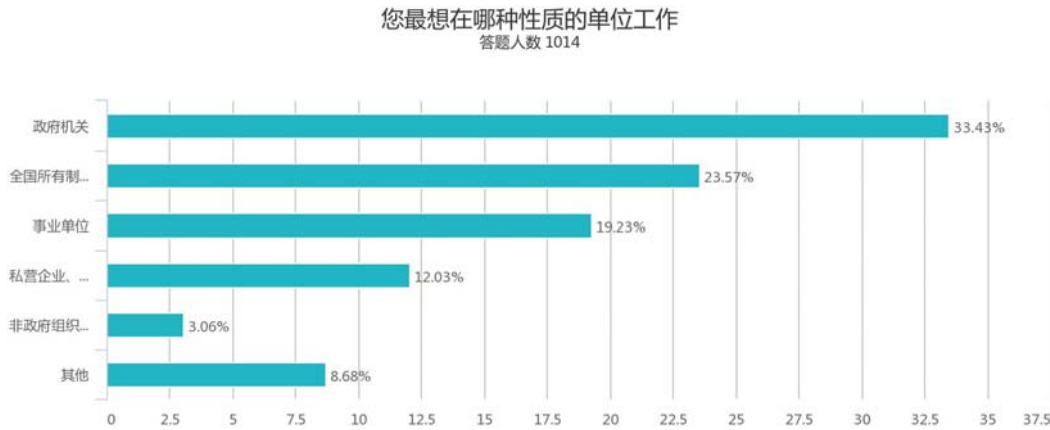
(图 4)

#### 4、就业地点选择

作为离开家乡在异地求学的很多藏族大学生来说，回到家乡工作看起来是共同的“情理之中”的选择，这次调查也显示基本如此。调查显示想在藏区工作的大学生占 93.49%，有 5.62% 的学生想在北京、上海、广州以及其他东部省市就业，其余 0.89% 则选择在其它地方工作。对于就业地点的选择，如（图 4）所示，68.86% 的学生认为就业地点的选择应该因人而异，10.36% 认为藏族大学生不该在内地就业，在其它观点中有一部分表示应该先在内地工作锻炼几年，之后再回西藏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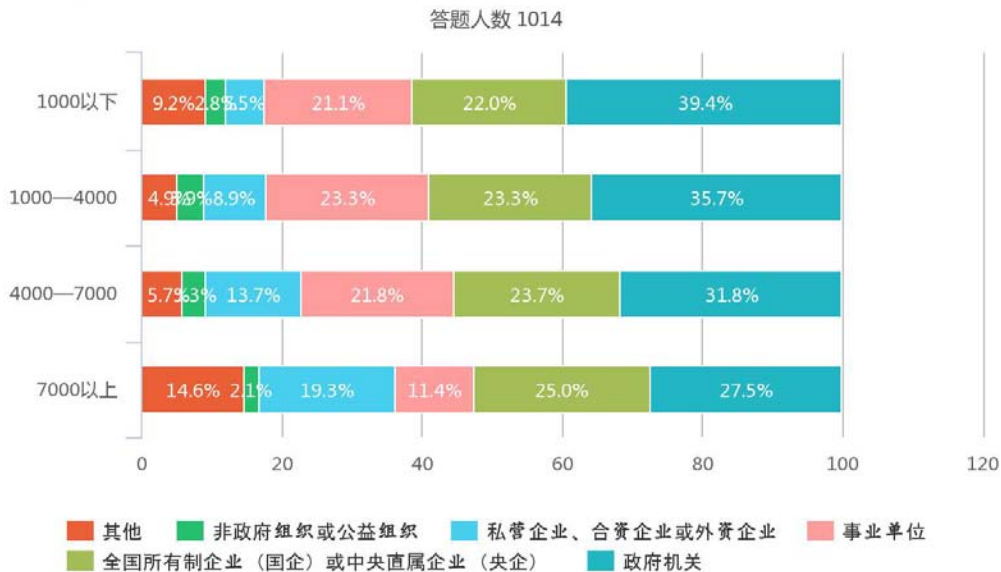
#### 5、就业单位类型

就业单位的选择不仅会影响未来的发展，也是学生本人、家长及亲友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此次调查结果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全国范围内的公务员热。（图 5）显示，想要在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就业的学生占 52.66%，只有少部分学生有意愿在非政府组织和私营企业工作。要在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一般都要通过公务员考试，为此我们也调查了学生们对公务员考试的看法。结果显示 30.47% 的学生表示不想参加公务员考试，而 22.88% 的学生表示一定要参加公务员考试，想参加公务员考试的则占 32.05%。随着就业形势的多样化以及就业观念的不断改变，预计未来愿意参加公务员考试的比重会略微下降。



（图 5）

#### Q4:您家庭月收入（元）是？ X Q16:您最想在哪种性质的单位工作





(图 6)

从专业角度看，法学类、农林学类和管理学类专业的学生想在政府机关就业的比例最大，分别占 50.9%、45.2%和 4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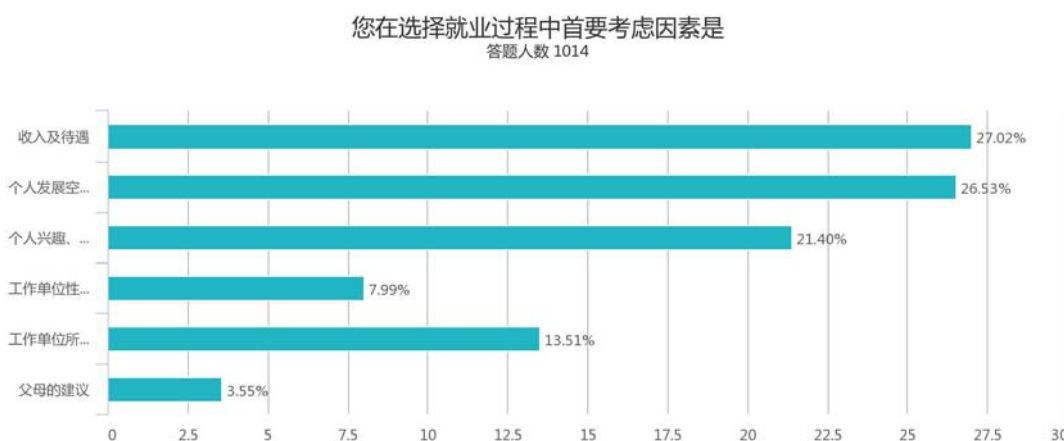
此外，对问卷结果进行交叉分析发现，被调查藏族学生的家庭收入越高，愿意在政府机关工作的比例越小。如（图 6）所示，家庭月收入超过 7000 元的学生中只有 27.50%的学生愿意在政府机关工作，而愿意去企业（国企或私企）工作的比例更大。

### 6、对创业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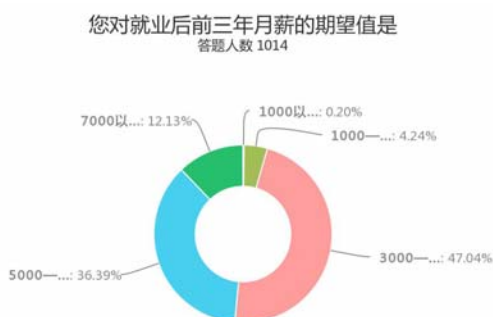
据我们观察讨论，越来越多的藏族大学生开始有自己的创业梦想，有些甚至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一部分在大学期间就开始自发组织从事民族特色产业、民族潮流服装、文化产业等工作的学生就是最好的说明。当然，创业并非易事，创业者不仅要有热情，也需要有充足的准备、丰富的经验以及足够的资源等条件。调查显示，想要创业的学生占 57.50%，创业意愿极强烈（一定要创业）的占 8.58%，另外 23.96%和 9.96%的学生分别表示未考虑和不想创业。是否选择创业也与性别有一定关联，数据显示男生创业意愿明显比女生强烈，男生创业意愿极强烈的占 14.7%，较强烈的占 60.6%；而女生这两项的比例分别为 4.0%和 55.2%。

### 7、就业考虑因素

大学生在就业选择过程中需要考虑哪些因素？不同的因素的影响程度多大？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调查了大家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结果如（图 7）所示，可见最主要的三个影响因素分别为收入及待遇、个人发展空间和个人兴趣爱好。



(图 7)



(图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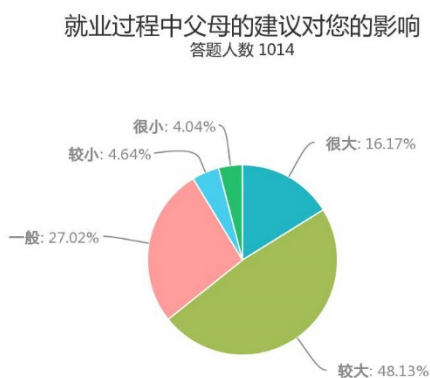
### 8、工作后对待遇的期望

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藏族学生中对就业后前三年的月薪期望值处在 3000—5000 人民币的占 47.04%，在 5000—7000 人民币的占 36.39%，超过 7000 元的占 12.13。以西藏自治区为例，2013

年西藏自治区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至 1150 元，月均工资维持在 3600 元左右。所以这一期望值浮动范围是可以接受的，随着藏区产业转型和经济增长的速度加快，工资收入水平也有逐渐上涨的趋势。

### 9、父母的建议对就业的影响

子女的就业和发展无时无刻不牵动着父母的心，子女面临就业时父母往往会提出很多建议。那么这些建议对子女的影响程度如何呢？调查结果显示，认为父母的建议对自己的选择影响很大的占 16.17%，认为较大的占 48.13%，认为影响很小和较小的总共占 8.68%，还有 27.02% 的学生表示父母的建议对自己的影响一般。可见父母的建议对子女就业有较大的影响，结合我们的自身经验不难发现，这种影响不仅仅表现在择业上，也表现在就业观念上。如（图 10）所示，对问卷结果做交叉分析发现，受父母建议影响很大的学生选择在政府机关工作的比例最大，占 45.12%，较大的占 33.20%；与之相对，受父母建议的影响很小的学生想在国企和央企工作的比例最大，占 36.59%。这也侧面反映了目前大多数父母对子女的建议是在政府机关工作。从性别角度看，女生受到父母建议的影响程度要大于男生，男生认为父母的建议影响很大、较大的共占 58.70%，而这一比例在女生中占 68.50%。



（图 9）

	Q16:政府机关	Q16:全国所有制企业（国企）或中央直属企业（央企）	Q16:事业单位	Q16:私营企业、合资企业或外资企业	Q16:非政府组织或公益组织	Q16:其他	受访总人数
Q27:很大	45.12% 74	14.63% 24	16.46% 27	10.98% 18	4.88% 8	7.93% 13	164
Q27:较大	33.2% 162	24.59% 120	21.31% 104	10.66% 52	3.07% 15	7.17% 35	488
Q27:一般	28.47% 78	24.82% 68	17.15% 47	16.06% 44	1.82% 5	11.68% 32	274
Q27:较小	34.04% 16	25.53% 12	19.15% 9	10.64% 5	4.26% 2	6.38% 3	47
Q27:很小	21.95% 9	36.59% 15	19.51% 8	7.32% 3	2.44% 1	12.2% 5	41
受访总人数	339	239	195	122	31	88	1014

（图 10）

### 总结

由于样本容量有限，调查范围不广以及受其他因素影响，本问卷调查的结果仅具有参考意义，并不能完全反映真实情况。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藏区产业结构的逐渐调整，大学生自身知识水平的提高等原因，就业竞争将愈发激烈，藏族大学生的就业观念也会渐渐发生着变化。单从本次调研来看，所有人都一边

倒地从事公务员工作的状况将有所改变，就业结构也将变得更加多元。当然，每个人的就业观念都是受其家庭、教育背景、社会环境等因素影响而不一样的，这在本次调研结果中也有所反映。作为大学毕业生，就业时不仅要考虑自身意愿，也要考虑父母的期望、社会的需求等多种因素。为此在择业时应当充分获取信息，熟悉就业、创业相关政策，积极主动与父母、长辈交流，了解社会发展现状，在此基础上做出较为明智的选择。还未面临就业的大学生则需要在大期间扩充知识、锻炼能力，为自己日后的发展做好准备。

#### 问卷中的问题：

1. 工作类型选择的态度及影响因素：（1）学校，（2）专业，（3）户口
2. 公务员意向及影响因素
3. 创业态度及影响因素：（1）户口，（2）地区，（3）学校
4. 工作地区的选择影响因素
5. 户口类型与大学入学率（西藏 18%：81%）

就业考虑：类别、地区、工资

影响因素：户口、父母观念、专业、学校、地区、性别、专业观念、内地西藏班经历

## 【书 序】

### 传统文化承载者的世纪变迁

——李健《西藏的唐卡艺人》序言

马 戎

在中国西部边疆地区当中，历史上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相对较少的当属西藏。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四千多米，空气稀薄，干燥少雨，除少数河谷外。大部分土地并不适合农耕，藏北海拔 4500 米以上大片区域不适合人类生存。在 50 年代初期，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到 1 个人。在这样的地理和自然环境条件下，青藏高原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生态体系，并在这个自然生态体系中演化出来一个独立的人文生态体系。藏人、藏语文、藏传佛教便是这一体系中的核心元素。所以顾颉刚先生认为中国境内有三个大的文化集团，即汉文化集团，回文化集团和藏文化集团，青藏高原上的藏文化集团为其中之一。

自唐朝以来，当时西藏的吐蕃王国便与中原王朝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藏传佛教也成为中原佛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代，由于皇室笃信藏传佛教，西藏与内地的交往越加频繁。自 1792 年乾隆皇帝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后，西藏地区纳入清朝的行政体系，开始与内地建立了制度化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与人员交往。辛亥革命后西藏一度出现“驱汉”和追求独立的倾向。1951 年《十七条协议》签订后，解放军进驻西藏，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日益密切，1965 年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

尽管近几十年里西藏与内地的人员交流、经济关系日益加强，但是不同的生态体系和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差异和隔膜仍然十分明显。这也使得西藏研究和藏族文化研究成为国内民族社会学的重点研究领域。

我第一次进藏是 1988 年夏天，当时在费孝通先生和多杰才旦两位老先生的关心与支持下，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了一个西藏社会发展的研究项目，我和调查组的其他成员们一起组织开展了西藏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学户访问卷调查，在拉萨、日喀则、山南三个地区完成了有效问卷 1300 份。在这次调查所获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我在 1996 年出版了《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同心出版社）。也正是通过这个项目的调查，我结识了藏研中心科研处的旦增伦珠，调查组进藏期间，他是我们的联络人和协调人。1997 年他到北京大学攻读社会学的博士学位，之后长期担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与经济研究所的负责人。

90 年代我的关注点转移到了新疆，因此近些年几乎每年都要去几次新疆。加上年纪的原因，担心身体不适，便没有再去西藏开展实地调查了。这期间旦增伦珠也曾安排了我进藏的机会，联系了西藏大学与我开展科研合作，已经定好了机票，但是因为某些意外原因的干扰未能成行，这是我至今感到遗憾的一件事。但是我始终没有完全放弃西藏研究，多年来我一直努力在做两件事，一是积极招收藏族研究生，鼓励他们开展与西藏相关的调查研究；二是争取机会让我指导的各族研究生参加西藏科研项目。在这个方面，旦增伦珠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领导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有许多承担的研究课题也很需要受过社会学专业训练的调查人员。近几年来，在我指导的学生当中参加过西藏调查的先后有常宝、祖力亚提·司马义、李健、王娟、欧登草娃、王凡妹、旦正才旦、王向珣、常艳玲和尼玛顿珠共 10 人。而且我特别希望有其他民族背景的学生也有机会去西藏看看，从而对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些更直观的感受。以上参加了西藏调查项目的 10 名研究生中，分别具有蒙古、维吾尔、藏、回、汉等族群背景。

在上述学生当中，李健是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化德县的汉族学生，化德县紧邻我曾经工作过的锡林郭勒盟镶黄旗，从镶黄旗去呼和浩特要经过化德县。1977 年有一次因为没有班车，我曾经从化德县城徒步 60 多公里走回镶黄旗，所以我对化德有些感性认识。2009 年李健从厦门大学社会学系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后，考到北京大学。由于他具有内蒙古的生活背景，我一度计划让他专注内蒙古研究，还鼓励他学习蒙古语。后来旦增的西藏课题急缺调查人手，就把他派到了西藏调查组。谁知李健参加了西藏调查后，便对西藏着了迷，努力学习藏语，对西藏文化和西藏社会特别感兴趣。所以我也就改变了原来的计划，鼓励他继续从事西藏研究。

关于李健的博士论文选题，我也和他讨论过多次。他历次赴藏所参加的那些常规社会经济发展的专题调查、城乡居民家计调查等，固然可以在实地调查所获数据信息的基础上完成调查报告和专题研究论文，但是很难在学术层面上加以提高，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并不合适。我一直在想，李健的博士论文选题应该达到几个基本要求：第一，这个主题能够比较鲜明地反映和折射出西藏百年来深刻的社会变迁，为此要选择一个能够集中和生动反映社会急剧变化、文化被动转型的特殊社区或群体，这个群体必须有某种代表性，可视为西藏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的某种缩影，对于它所承载的区域文化特质、社会组织特征及其变迁的分析与讨论能够与社会学的核心议题要有一定的连接，换言之，相关的分析讨论必须具有较高的学术含量，围绕这一群体和相关专题的研究分析讨论要能够给学生提供在基础理论上拔高和开展学术对话的空间；第二，围绕这一选题的基础资料收集工作（包括调查时间、资料规模与调查难度）可以与一篇博士论文田野调查的工作量大致相当，人类学强调有一年的田野调查，对于这一主题的被选择群体的实地调查时间累计起来也应不少于一年；第三是这个选题的政治敏感度在实际调查活动中具有可操作性。现在许多政府管理的历史档案材料不对学者和社会公开，许多历史和现实选题仍被列入“政治禁区”，因此有些选题不仅调查难，成果发表也难。考虑到学生未来在就业和职称等方面必然面临论文发表的要求，那些有政治敏感度的研究专题也不宜安排学生作为学位论文选题。

通过我对西藏社会的文献阅读、实地感受及与藏族学者的交流，我感到有几个群体大致符合我的要求。这几个群体具有相对稳定的历史延续性，具有稳定的内部组织体系，所从事的职业是西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 20 世纪特别是 50 年代以来经历了衰落而又重新兴起的历史性转型

过程。同时，对于这些重大变化的过程描述和影响因素的系统分析，需要相当时间的文献整理和实地调查，而对于这几个群体的历史角色演变分析，也可以对西藏传统文化的历史走向提出学术层次的讨论。

其中第一个群体是西藏的僧侣群体，藏传佛教历史悠久，形成一整套寺庙组织体系和宗教文化知识体系。1951年喇嘛人数约占西藏总人口十分之一，1958年仍有2771座寺庙和11.4万喇嘛，而到了文化大革命后的1976年，只保存了8座寺庙和800名喇嘛。随着后来落实宗教政策工作的开展，1994年寺庙恢复到1552座，僧尼41800人。寺庙和僧人是藏传佛教的核心，寺庙数量和僧人规模的大起大落，可以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反映西藏的社会变迁和中央政府宗教政策的演变。相关研究还可以与国外的宗教群体研究进行比较和对话。但是，在藏区对寺庙开展深入调查的难度太大。且增伦珠曾经在哲蚌寺进行过调查，完成了一篇调研报告。他的经历使我确信这不是李健的适当选题。一是进入的难度大，寺庙近些年来成为“敏感单位”，政府派了“驻寺工作组”，僧人的抵触情绪也在预料之中。二是深入的难度大，如果不熟悉藏传佛教的经典文献，调查者很难理解僧侣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很难理解寺庙的运行规则。而宗教社会学研究之所以难度特别大，就是因为研究者必须是所研究宗教的专家，但又不能是这个宗教的虔诚信徒。不是专家就无法理解宗教组织和教徒的理念与行为，但是一旦成了某一个宗教的信徒，也就难免丧失了从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超脱立场来客观地分析各种宗教组织和教徒活动的的能力。从以上各方面考虑，我认为这不是适合李健的博士论文选题。

另一个群体是西藏的说唱艺人或游吟歌手。这也是一个古老的群体，希腊神话的许多内容，便是由说唱艺人荷马得以流传。西藏的《格萨尔王》是藏族说唱艺人最经典的话本，近年来挖掘收集的《格萨尔王》共有120多部，100多万诗行，2000多万字，这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除了寺庙保存的抄本外，《格萨尔王》在民间的传播主要靠四处旅行的说唱艺人。这个群体在50年代后基本消失，到了80年代又重新出现。随着《格萨尔》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藏学研究的一个专门领域，《格萨尔》版本的收集和说唱艺人的传承也开始受到文化部门的重视，据说现在的西藏还有几百位能够表演《格萨尔》的说唱艺人。这个群体也可以作为一个研究专题来进行调查，但是对研究者的藏语文水平要求较高，这个选题更适合民俗学或文化人类学者来进行调查研究。

我所考虑的最后群体就是唐卡画师。唐卡是西藏特有的与藏传佛教密切联系的用彩缎装裱后悬挂供奉的宗教卷轴画<sup>1</sup>。在寺庙和藏民家中通常都会看到各种不同档次的佛像唐卡供奉在佛堂里。绘制唐卡大多采用天然石材加工颜料，从公元7世纪有文字记载以来至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唐卡从地域上形成了三大主流画派：卫藏地区的勉唐画派，康巴地区的噶玛噶孜画派和安多地区的热贡画派。唐卡以宗教内容为主，在传统上唐卡画师以僧人为主，师徒相授，把唐卡绘画视为一种特殊的宗教修行，形成西藏社会的一个特殊的行业体系。藏区著名的大活佛都有自己专门的唐卡画师。这个社群历史悠久，过去有自己的职业组织与行规，在1959年随着宗教活动的淡化一度销声匿迹，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寺庙的重建和旅游业的发展再度兴盛起来。神圣的唐卡现在成为市场上销售的旅游商品，在拉萨的街角摊铺里充斥了粗制滥造的唐卡，唐卡在旅游市场上的热卖不仅使得拉萨、昌都等地出现了许多唐卡画廊和大小作坊，一些精致的唐卡甚至来自境外的尼泊尔。唐卡画师的社会组织也在市场冲击下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一个与宗教密切

---

<sup>1</sup> 根据制作唐卡所用材料，唐卡分为两大类。第一类用丝绢制成的叫“国唐”，下分五种：(1) 绣像“国唐”（用各种不同的丝线经手工刺绣而成），(2) 丝面“国唐”（各色丝绢切成各种形状用针缝接），(3) 丝贴“国唐”（将切成的各种彩色布块用胶粘在画布上），(4) 手织“国唐”（用丝线经手编织而成），(5) 版印“国唐”（用墨或朱砂作颜料用套版直接印在丝绢上）。第二类用颜料绘制的唐卡叫“止唐”。下分五种：(1) 彩唐（用各色颜料画成），(2) 金唐（用金色颜料画背景），(3) 朱红唐：（用朱红色颜料画背景），(4) 黑唐：（用墨色画背景），(5) 版印“止唐”（印在棉布做成的画布）。

联系的传统手工画师群体，在近半个多世纪里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这一演变过程必然为我们观察和分析西藏社会变迁提供一个绝好的视角。而且，相比寺庙僧侣集团，唐卡画师群体更容易进入和调查，不存在任何政治敏感性的问题，而且社会学的经典理论和研究方法也可以派上很好的用场。从以上诸方面考虑，我建议李健考虑把唐卡画师群体的历史变迁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

李健接受了我的提议，而且在随后的西藏调查活动中努力把唐卡画师群体作为自己的调查对象，他先后完成了在拉萨、康区和尼泊尔的田野调查，2012年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这本《西藏的唐卡艺人——职业行为变迁与多元平衡策略》即是李健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这本书详细地介绍了唐卡的发展史，以及历史上唐卡画师群体的传承与执业模式，分析了宗教信仰、艺术追求和市场赢利这三个因素和各自背后的三种追求给唐卡画师的观念和和行为造成的影响。这本书基本上给我们勾画出西藏唐卡画师这个特殊群体在西藏社会变迁中的地位演变，以及画师们在“修行”和“牟利”二者之间的徘徊与选择。总体来说，李健的这本书达到我对这个选题的期望，是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

但是在比较研究和深层次学术命题的讨论上，这个选题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宗教用品制作是伴随着宗教发展与传播而出现的一个特定行业。西方基督教、东正教的圣像制作者即是一个古老而神圣的行业，在历史变迁中经历了复杂的演变。我国内地各类庙宇的佛像及其他神像制作也有漫长的历史，尽管制作者可能还有其他兼业，但是毕竟在产品制作范式、人员组织形式上与唐卡画师之间存在某种共性。在这些不同地区的宗教用品制作者行业之间是可以开展比较研究的。这方面可以说是这个选题有可能扩展的一个空间。

藏传佛教直至20世纪50年代，仍然是一个保持了中世纪“政教合一”特点的宗教群体，宗教领袖即最高行政首领，各级政府中僧官多于俗官，寺庙实际上垄断了教育。基督教正是通过16世纪马丁·路德发动的宗教改革才打破了这种“政教合一”体制，并在改革后的新教伦理中孕育出资本主义精神。藏传佛教如果要与现代工业文明和国家体制相适应，宗教改革势在必行。1959年达赖流亡印度后，这种“政教合一”体制在西藏实际上已经被打破了，但是并没有反映在宗教教义和广大教众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中。因此，宗教组织的复兴中包含了多种值得调查与思考的倾向。这些很可能也会出现在与宗教密切关联的唐卡画师群体中，唐卡画师的宗教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僧侣的宗教观，在这些方面的深度挖掘与思考也还有待进一步开展。李健的专题研究还只是在这个方向上迈出的第一步。

2013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李健转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社会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这也给了他许多机会返回西藏从事社会调查，据说他的藏语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今年刚毕业的我指导的另一个硕士研究生旦正才旦，是一个来自青海循化的藏族青年，他也加入了这个研究所的研究团队。我在北京大学无法组织这样的研究团队，但是很高兴看到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这个研究所开始聚集起一些优秀的青年研究力量。这是让人深感欣慰的一件事。

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李健最后修订完成了这本书稿《西藏的唐卡艺人——职业行为变迁与多元平衡策略》。我很高兴为李健的这本书写一篇序言，也期待着这几个年轻人在西藏社会研究方面不断做出更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